

从吴文藻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 学术阅读看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根基 基于吴文藻日记的考察

社会
2026·2
CJS
第 46 卷

孙飞宇

摘要：本文基于吴文藻先生从 1956 年到 1985 年间的日记，借用知识考古学的视角，系统考察了他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及其和潘光旦、费孝通、林耀华等人的学术工作与互动。研究发现，中国社会学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的恢复与重建工作并非在一片空白之上进行。在社会学被取消的历史时期，吴文藻等人依然坚持的学术阅读使其学术眼界跟上了当时世界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学科的发展，确知了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的主流和经典。70 年代和海外的学术交流帮助他们更加深入了解了世界社会科学发展的脉络与发展前沿。这些都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火种与基本条件。更为重要的是，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们维系了在燕京时期建立的学术共同体，吴文藻当年发展“燕京学派”的种种策略以及这个共同体的延续，也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经验与根基。

关键词：吴文藻 日记 学术阅读 学术共同体 社会学重建

DOI:10.15992/j.cnki.31-1123/c.2026.02.008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s Sociology
as Seen Through Wu Wenzao's Academic Reading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n Examination Based on Wu's Diaries**

SUN Feiyu

Abstract: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in 1979 marked a significant event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in China. Today there is an established standard narrative regarding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begins by asking: Is there a prehistory preceding this starting point?

Based on Mr. Wu Wenzao's diaries from 1956 to 1985,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 作者:孙飞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Author:SUN Feiyu,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E-mail: sunfeiyu@pku.edu.cn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吴青女士和福建冰心文学馆的大力支持,特此表示感谢。

examines his academic reading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as well as his academic work and interactions with Pan Guangdan, Fei Xiaotong, Lin Yaohua, and other scholar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resto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did not take place on a blank slate. Despite the abolishment of sociology and severe disruptions to their personal lives and well-being, Wu Wenzao and other scholars, as a community, continued to engage in academic reading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This allowed them to keep pace with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such as sociology, anthropology, and ethnology and enabled them to gain a firm grasp of the mainstream trends and classic works of social sciences worldwide. Moreover, academic exchanges with overseas scholars in the 1970s helped them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s of global social sciences. All these factors served as the academic spark and fundamental condition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More importantly, over many years, Wu Wenzao and Fei Xiaotong maintained the academic community established during the Yanjing period. The strategies that Wu Wenzao employed in developing the “Yanjing School”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is community became the implicit foundation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ese sociology.

This paper employs Michel Foucault’s method of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o explore the readings of scholars represented by Wu Wenzao during the period when sociology was banned in China. This study finds th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standard narrative of sociology’s reconstruction resembles more a “turning point” of knowledge and power: after this starting point, previously silent knowledge began to emerge from history, regaining space and power. Consequently, the readings of Wu Wenzao became a peculiar “prehistory”: highly foresighted and preparatory, they provided the conditions, perspectives, historical experiences, and numerous possibilities for the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led by Fei Xiaoto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newed body of 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

Keywords: Wu Wenzao, diary, academic reading, academic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of sociology

一、中国社会学重建的“标准叙事”及其“史前史”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历史是 20 世纪中国社会学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段历史在中国社会学界已经为人所共知,甚至有了某种

意义上的“标准叙事”。这个标准叙事的起点包括 1979 年 3 月 15 日至 18 日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筹备处召开的“社会学座谈会”以及胡乔木和费孝通在会上的发言、成立中国社会学研究会等一系列事件(杨善华, 2019), 还有 1979 年 3 月 30 日邓小平(1993)关于社会学等学科要“补课”的讲话等内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 就已经存在这一关于中国社会学重建史的标准叙事起点(王育民, 1989; 费孝通, 2002)。许多学者的回忆和研究为这一框架补充了诸多丰富的细节和资料(阎鹏, 1990; 杨心恒, 2015; 周晓虹, 2023)。胡洁、周晓虹(2023)将 1979 年至 1981 年视为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准备时期”, 认为这一时期“具有无可比拟的社会学意义”。这一判断固然重要, 但对于这一时期更为深入的研究却“仍然是社会学史研究中的一个空白”(张龙, 2021)。

本文尝试更进一步, 探求在这一标准叙事起点背后的重建线索与重建的内在机制。就此而言, 该叙事起点是否存在一个“史前史”? 王炳根(2014)发现, 1979 年的座谈会之前确实存在一个社会学重建的酝酿过程。通过对于吴文藻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学术阅读史的研究, 本文进一步提出, 吴文藻与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在重建前的学术工作和学术阅读、与海外的交流以及学术共同体的维系, 是重建更为具体的背景与基础, 堪称社会学重建的“史前史”。由此, 重建还有着和当年吴文藻创建“燕京学派”时极为类似的行动与策略结构。

二、本文的资料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基于吴文藻先生的日记和学习笔记。1956-1985 年间, 除了 1958 年、1966 年 9 月到 1971 年 6 月以及在 80 年代由于生病住院所导致的短暂间断, 吴文藻几乎一日不缺地记了日记, 偶有空缺, 也都在日后做了补记。这些日记或简略或详细地记录了以吴文藻为中心的学术群体在这 30 年间的日常生活、工作、会议尤其是学术阅读的内容。¹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 日记中不仅记录了吴文藻自己和冰心, 还记录了潘

1. 需要说明的是, 本文虽然已经尽力涵盖吴文藻的大部分阅读书目, 但确实无法将日记中所记载的阅读书目全部列出。这一方面是由于在数量庞大的阅读书目中梳理出线索必须做到简繁得当, 另一方面是由于日记的部分笔迹难以辨认, 或是仅仅记载作者名字的一部分, 或是简写而致无法确认。

光旦在去世之前的许多事宜以及费孝通、林耀华、瞿同祖等人和他的日常交往与学术往来。1979 年之后，日记记录了许多关于社会学恢复与重建的历史。这些记录构成本文重要的研究基础。

表 1: 吴文藻日记本编码²

日记本	日期	记录内容	编码
日记本 1	1956 年 1 月 1 日—1957 年 12 月 31 日	日记	RJB01
日记本 2	1959 年 2 月—1961 年 ³	学习笔记	RJB02
日记本 3	1959 年 3 月 3 日—1960 年 2 月	日记、参观学习笔记	RJB03
日记本 4	1959—1961 年	学习笔记	RJB04
日记本 5	1961 年 1 月 1 日—1961 年 12 月 31 日	日记	RJB05
日记本 6	1962 年 1 月 1 日—1963 年 8 月 31 日	日记	RJB06
日记本 7	1961 年 11 月 24 日—1963 年 6 月	学习笔记	RJB07
日记本 8	1963 年春—1964 年 2 月	学习笔记	RJB08
日记本 9	1963 年 9 月 1 日—1965 年 8 月 10 日	日记	RJB09
日记本 10	1964 年 5、6 月	泰安霸县学习笔记	RJB10
日记本 11	1964 年 3 月—1965 年 7 月	学习笔记	RJB11
日记本 12	1965 年 8 月 11 日—1966 年 2 月 28 日	日记、学习笔记	RJB12
日记本 13	1966 年 3 月 1 日—8 月 29 日, 1971 年 6 月 13 日—1972 年 12 月 31 日	日记、学习笔记	RJB13
日记本 14	1969 年 1—4 月, 1970 年 6—12 月	学习笔记	RJB14
日记本 15	1971 年	学习笔记	RJB15
日记本 16	1973 年 5 月	华东之行学习笔记	RJB16
日记本 17	1973 年 6 月	华东之行学习笔记	RJB17
日记本 18	1966 年 3—6 月(学习笔记), 1973 年 1 月 1 日—1974 年 6 月 30 日	学习笔记, 日记	RJB18
日记本 19	1974 年 7 月 1 日—1975 年 12 月 31 日	日记	RJB19
日记本 20	1976 年 1 月 1 日—1977 年 5 月 31 日	日记	RJB20
日记本 21	1977 年 6 月 1 日—1979 年 12 月 31 日	日记	RJB21
日记本 22	1980 年 1 月 1 日—1981 年 8 月 5 日	日记	RJB22
日记本 23	1981 年 8 月 6 日—1985 年 6 月 30 日	日记	RJB23

2. 本文根据日期把日记和标明引用的日记本进行了编码。例如, 1984 年 1 月 12 日日记, 来自吴文藻 1981 年 8 月—1985 年 6 月 30 日日记本, 编码分别为 RJ19840112 和 RJB198108—19850630。如有同一年的多个日记出处, 则用顿号分隔开不同的月日, 或者用分隔符表明日期间隔。为简明起见, 若在正文中说明了具体日期, 则不再在注释中注明, 反之则会在注释中注明。本文所使用的日记和笔记本均收藏于福建冰心文学馆, 在后文中将不再一一注明馆藏来源。

3. 学习笔记本有只标明年月而未标明具体日期的情况。

本文致力于通过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发掘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的中国社会学重建史起点的背景和基础,并把这一重建史置于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史背景下来加以理解。与此同时,本文将把吴文藻的日记置于他的生命史之中来理解,即把他的研究和阅读兴趣置于其毕生学术谱系中加以考察。例如,吴文藻在 60 年代对于印度等地区的研究工作和阅读兴趣,与他在三四十年代在“社会学中国化”的总体设想中对于中国边疆研究的兴趣与工作一脉相承。他在六七十年代对于韦伯、帕森斯、默顿和米尔斯等学者思想的关注和梳理,则与他在三四十年代的海外交流有着直接的关系。基于日记的研究会导致资料来源的单一和琐碎,为了避免这一问题,本文将对照冰心的著作和日记、潘光旦的日记以及吴文藻、费孝通等人的论述与著作来展开研究。

在《自我书写》一文中,福柯(2016a:227)通过对于塞涅卡等人的日记和通信所做的分析提出,此种书写对自我的塑造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福柯所研究的书写与吴文藻的日记当然不能简单通用,不过我们可以借鉴这一研究的视角,因为吴文藻先生同样是通过日记和学习笔记的写作完成其后半生的自我塑造的,同时在中国语境下提出何为“作品”的问题。

三、编纂与翻译:吴文藻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学术工作

根据吴文藻(1982:51)的自传,从 1959 年到 1966 年,其主要学术工作如下:

1959 年至 1966 年期间与费孝通共同进行校订几种少数民族史志……的初稿;为中宣部提供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的评介和资料摘述;……为《辞海》第一版民族类词目撰写释文及审阅修订草稿;多次为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提供大量资料及意见,并担任校订民通译美国科学家保林的《不要再有战争》……和英国阿拉斯太尔·蓝姆著《中印边境》;……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情况的英文参考资料。⁴

吴文藻为《辞海》第一版的民族类撰写和审定了 130 个条目。所谓

4. 根据阅读实际情况,如果当时阅读的著作是英文版,则本文以英文来书写书名和作者,如果是翻译过来的中文版,则会以中文书写。

“外交部交办的边界问题”指的是就中印等边境问题为外交部承担的资料搜集和翻译工作。《不要再有战争》(*No More War*)一书的译者“民通”显然指民族学院的费孝通，不过吴文藻这里的表述并不准确，因为从 1964 年到 1965 年的日记表明他实际上参与了这本书的翻译。从 1964 年 4 月 24 日起，吴文藻日记里出现了大量关于翻译本书和校对费孝通译文的记录。例如：

今日开始翻译保林书《不要再有战争》。我从附录着手，
……(中午)返后继续翻译。晚查人名汉译。(RJB09)

吴文藻和费孝通搜集帕米尔高原地区资料并装订成册一事，完成于 1964 年 7 月。此时，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封面格式及编辑体例”(RJ19640703-0715, RJB09)问题。“文革”开始后，这些资料均散佚，不过在 70 年代返回北京并重新开始学术工作后，吴文藻和费孝通二人重新搜集、打印、装订了这部分资料。

1971 年 8 月 8 日，吴文藻和冰心回到北京，进入民族学院新成立的研究室。此后，他的学术工作如下：

返校后，作为民院研究院新设的编译室成员，和室内其他同志共同翻译并校订了尼克松《六次危机》的下半部分，……共同翻译了美国海斯·穆恩·韦兰合著的《世界史》……和英国大文豪韦尔斯著《世界史纲》；……1976 年与费孝通共同搜集有关《帕米尔及其附近地区历史、地理、民族英文参考资料汇编》原打印本装成六卷，油印共出五卷；……为编译室《民族问题资料摘译》推荐有价值的英文资料，并校订部分汉译文稿；完成了《辞海》世界民族类词目第二版的修订工作等。

(吴文藻, 1982: 51)

1971 年 11 月 6 日至 12 月 11 日，吴文藻、冰心、林耀华和饶毓苏等人翻译了尼克松《六次危机》一书的第二章和第五章。《世界史》一书最后是由吴文藻统一校对的，他 1972 年的日记大多以记录校对和翻译事宜为主。1973 年起翻译的《世界史纲》一书仍然由吴文藻总体把握、统一校正和修改，请冰心润色译文，于 1977 年年底交稿。1976—1977 年的日记主要以记载校对工作为主。⁵此外，与翻译工作相关，吴文藻和费孝通等

5. 译稿原计划在 1977 年上半年交稿。1977 年 6 月，人民出版社还给吴文藻送来了 Basil Davidson 的 *Africa in History* 一书，供其考虑是否要作为下一本翻译的书（转下页）

人这一年还做了大量民族和国别史资料的汇集编纂工作。⁶ 吴文藻本人主要集中于印度、马达加斯加、叙利亚和锡克等国家、地区或民族。

《辞海》修订工作在 1972 年重新启动,到 1974 年 8 月 15 日,吴文藻完成了其中和世界民族类词目有关的写作、修订与校对工作。此外,他还做了许多其他的学术工作。例如,在 1976 年,他帮助张青校对了华尔的《拉萨和它的神秘》,⁷ 也为人民出版社的《林肯传》做了校阅工作,等等。⁸

吴文藻的日记表明,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除了上述学术工作,他还阅读了大量的学术文献。这些学术阅读的出发点通常与他的学术工作有关,但也有相当部分是出于他自己的兴趣和思考。

四、20 世纪 60 年代的学术阅读:把握前沿、梳理经典与边政学的实践

吴文藻的日记表明,在 60 年代,国内学界虽然没有和国外的直接交流,但是学者们可以订购外文书籍和期刊,尽管在手续上可能较为繁琐和费时。例如,1961 年 7 月 31 日,吴文藻一早到研究所图书馆参加了“预订外文杂志会议”(RJB05);1961 年 11 月 17 日,吴文藻记述:“听说(关于)新疆一批外文书已采购来。这是 1956 年前我经手想办的一件事。现在实现可慰”(RJB05);到了 1962 年 5 月 19 日,吴文藻终于“在所校阅新疆外文书目”(RJB06);1962 年 6 月 2 日,吴文藻“将急需借用的外文书单开出”(RJB06),交给了相关工作人员;1963 年 5 月 9 日,吴文藻在日记里写道:“上午阅看书目,准备开第二批书单”(RJB06),到 5 月 11 日,他与费孝通共同拟定了这份书单。除了民族学院的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也是吴文藻阅读书籍的一个重要来源。1962 年 2 月 12 日,吴文藻在日记里记载了办理向北京图书馆借阅图书手续的事宜(RJB06)。

(接上页)目。此时,吴文藻对于翻译工作应该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权。他原计划下半年选译《种族、科学和社会》一书中的部分内容,在 1976 年 11 月 4 日还列了另外两本书的书名,推荐纳入 1977 年的翻译计划,“明年下半年翻译计划两项书名开出交金天明纳入明年规划”[RJ19761102、1104(RJB20, RJB21)]。

6. RJ19710830(RJB13, RJB13)。

7. RJ19760413-0415(RJB20)。

8. RJ19760429(RJB20)。

吴文藻在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对于学术期刊尤其是海外期刊的阅读和对于海外学术著作的阅读。他的阅读有三个主要面向：其一，把握学术前沿，他的阅读对象包含各种英文学术期刊和英文学界的最新出版物，这使得他能够把握世界社会科学学术的前沿发展；其二，细致梳理世界社会科学的学术潮流和经典作品；其三，通过研究和资料汇编延续自己在边政学研究方面的学术兴趣。

（一）对中外学术期刊的阅读：把握学术前沿

吴文藻对于欧美的专业期刊向来非常重视。1937 年 4 月 4 日在巴黎跟随莫斯(Marcel Mauss)游学期间，他就曾在信件中询问莫斯何处能够阅读到欧洲关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期刊，并希望得到一份欧洲顶级期刊列表(孙飞宇, 2025: 98)。

在 20 世纪 60 年代，吴文藻一直没有中断过对于中英文学术期刊的阅读。例如，1962 年 11 月 4 日，他在日记里记录了自己当天“清理 1962 年十几种中西文杂志”(RJB06)一事；1964 年 10 月 29 日，他记录了自己在研究所“楼下翻看最近几种外文专业杂志”(RJB09)。即使是中文学术期刊，他的阅读也是以《外国学术资料》⁹和《国外社会科学杂志》¹⁰为主。他所记录的海外期刊主要包括如下几种：

(1)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期刊《科学与社会》(*Science & Society*)¹¹

(2) 1960 年创刊于香港的杂志 *Eastern Horizon*¹²

(3) 由美国著名思想家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创办的左翼杂志《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¹³

(4) 美国 60 年代创刊的《自由之路》(*Freedom Ways*)¹⁴

(5) 人类学方面：《当代人类学》(*Current Anthropology*)¹⁵ 和由 A. L. Kroeber

9. RJ19630516(RJB06)。

10. RJ19751010(RJB19)。

11. RJ19610830(RJB05)。他在当天的阅读集中在该期刊上关于涂尔干学派“从未涉及冲突研究”的批评性文章。

12. 该杂志系“香港寄来的英文杂志”[RJ19620521(RJB06)]。

13. RJ19750603(RJB19)。

14. RJ19630909(RJB09)。据日记记载，阅读该刊物是为了了解非洲民族研究的最新进展。

15. “上午在所查阅有关 *Morgan* 传记资料。无意中发觉所内已订阅 *Current Anthropology* 杂志。最近期载有对摩尔根与唯物主义的争论文章。着手翻译《美国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摩尔根传记作者所写的一篇短文”[RJ19640702(RJB09)]。接下来几天，吴(转下页)

主编的《今天人类学》(*Anthropology Today*)¹⁶

(6) 美国人类学会和英国皇家人类学会的期刊。¹⁷

1963年9月18日,吴文藻记载,自己阅读这些杂志主要是为了“查近10年来有代表性的理论名著”(RJB09)。此种阅读专业期刊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了20世纪80年代。例如,1980年4月,吴文藻阅读了期刊《美国人类学家》(*American Anthropologist*),主要目的是了解新近出版的学术著作。¹⁸

通过这方面的阅读,吴文藻了解了国外的学术进展。例如,1965年1月14日,“竟日阅看三本美国社会学杂志,年轻一代有许多新人出现,为前所不知”;15日,“竟日续看63—64年间美国社会学杂志上的书评及新书单,随看随作笔记”。然而,在阅读了这些新研究者的工作以后,他颇感失望,因为这些研究者“人物虽新,但新书论点无新可言”(RJB09)。

(二) 社会科学各流派的梳理与学科经典的确立

吴文藻在这一时期的阅读从翻译工作的需要开始,逐渐延伸到了更为广泛的学术兴趣和领域。这一扩展在工作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辞海》的条目编写工作,在人类学和民族学之外还涉及社会学的部分。这一工作要求他对于社会科学的各个流派都做出较为相近的梳理。

1961年7月19日和20日,吴文藻和费孝通连续参加相关会议,讨论与社会学有关的辞目分工写作问题。1961年9月19日至24日,吴文藻将自己此前记录的法国年鉴学派的资料整理了出来,¹⁹应该也是为此做准备。

1963年9月20日,吴文藻记录:“上午在所续改各宗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及其代表著作”(RJB09)。在后续多日里,他“在所进一步细校进化论派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²⁰23日,他梳理了法国的涂尔干—莫斯(接上页)文藻翻译了关于摩尔根的这篇短文。他于1964年7月的阅读和摘录也基本都集中在摩尔根的生平与著作方面。吴文藻保持了阅读该杂志的习惯,一直到1979年还有日记记录他阅读了该杂志的最新一期[RJ9790531(RJB21)]。

16. 吴文藻阅读该杂志以了解当时西方学界关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研究的主要流派、著作和代表性学者,并由此“拟定民族学主要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简表”[RJ19630913、0914(RJB09)]。“今天人类学”为吴先生在日记中的翻译。

17. RJ19630918(RJB09)。这些期刊主要是从林耀华处获得的。

18. RJ19800411、0419(RJB22)。

19. RJ19610919、0923、0924(RJB05)。

20. RJ19630921、1007(RJB09)。

学派的书目(RJB09),25日又写了博厄斯(Franz Boas)学派及其代表著作,26日上午写了“播化学派”(RJB09),27日则集中在美国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对以本尼迪克特(R. Benedict)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学派的文化研究做了总结,²¹对于功能学派的新进展包括对于工业社会中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和在非洲政治研究中的应用也都做了总结。²²1963年10月8日,吴文藻开始撰写“民族学各学派大纲”。²³到当年12月19日,吴文藻开始阅读 Mandelbaum 等人编著的在1963年刚出版的 *The Teaching of Anthropology* 一书,以查阅书中人类学各流派的书目。²⁴

阅读兴趣扩展的另外一个原因则与商务印书馆的外国学术名著译介计划和吴文藻为中宣部提供关于西方社会学新出名著的评介和资料摘述的工作有关。借此机会,吴文藻对于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各学派的重要人物及其代表作都做了广泛而系统的梳理。

商务印书馆的计划开始于60年代早期。1961年6月20日晚上,“孝通来家开资产阶级社会学书单”(RJB05)。第二天,吴文藻和费孝通在商务印书馆参加了由时任总经理兼总编辑陈翰伯召开的会议,讨论“社会学书单事”(RJB05)。

1964年12月17日和18日,中宣部等部门派人访问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讨论“编译资产阶级社会学和民族学事”(RJB09)。1965年1月11日和12日,吴文藻将此前记录的社会学和民族学书目资料取出,为此事做准备。1965年1月20日,应该是出于这一目的,有关部门给他送了“大批书来”,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阅读的好机会,于是当即“翻阅部分,立即登记”(RJB09)。到了次日,他仍“竟日翻阅新书”(RJB09)。恰好在这一天,商务印书馆寄来了《人道主义人性论研究资料》第五辑,其中包括弗洛姆的作品。吴文藻在当天傍晚去费孝通家通知他到自己家里

21. 到了10月12日,吴文藻对于该学派有了进一步认识:“对美国‘文化与人格’学派的由来明确。萨丕尔是此派先驱。并获悉进化论派当前代表怀特乃是他的学生”;10月17日,他继续写作并完成了“美国文化与人格派”(RJB09)。

22. 到10月15日,“功能派稿拟成”[RJ19630930(RJB09)]。

23. 到10月13日基本完成,“上午在家边抄边改民族学各流派大纲”;1964年1月13日和15日,在校对完《辞海》的辞目后,“又开始回到民族学流派大纲修订工作”;1964年7月23至25日,伴随着对摩尔根年谱的整理,吴文藻还在继续整理这一主题的资料,开始集中在“美国民族学发展情况”(RJB09)。

24. RJ19631216、1217、1227、1230(RJB09)。

阅看新书。第二天,费孝通来到老师家,浏览了一遍新书,并带走若干本阅读。1965年2月12日,吴文藻和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开会讨论并确定了推荐翻译的书目,15日将最后确定的书目交出(RJB09)。

借助这些工作,吴文藻既延续了自己曾经的学术兴趣,也了解了世界社会学的发展状况。在国内外的学术界没有直接交流且社会学亦被取消的背景下,吴文藻通过大量的学术阅读,把握到了时代学术潮流,也敏锐确知了西方社会科学界逐渐建立起来的主流和经典作品。毫无疑问,这是一种有学科意识的学术阅读。

首先,在阅读中,吴文藻延续了早年间对于知识社会学等领域的兴趣,并且产生了对于社会心理学的兴趣。

1964年2月16日,吴文藻在费孝通家重新翻阅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和《文化社会学论文集》(RJB09)。3月8日,他索性将《知识社会学》一书从费孝通处借来阅读。翌日,他又将《文化社会学论文集》一书借来阅读,尤其集中在其中的“知识分子论”部分(RJB09)。吴文藻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内容一直都非常感兴趣。20世纪30年代,他曾率先在国内介绍曼海姆及其《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1964年9月5日,吴文藻又继续翻阅曼海姆的著作(RJB09)。不过,他的阅读并不仅限于此。到了当年11月9日,他在自己的藏书中翻出了夏康农翻译的法国学者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所著的《实验科学方法论》一书,读了其中的“译者序”(RJB09)。

在阅读过程中,吴文藻对“异化”问题尤其感兴趣,他计划阅读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卢卡奇的作品,并且对于影响卢卡奇的社会学家如齐美尔、韦伯和狄尔泰等人也都产生了兴趣,希望了解卢卡奇是如何影响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²⁵与此同时,吴文藻对于弗洛姆也有了高度的阅读兴趣,开始阅读他的《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一书。²⁶到了1966年初,吴文藻和费孝通还阅读了弗洛姆的《逃避自由》一书,并共同写了书的简介。1966年2月22日,“傍晚孝通将写好的 Fromm 的 *Escape from Freedom* 的意见送来”;²⁴24日,吴文藻对费孝通写的《逃避自由》的意见做了一些补充,下午与费孝通讨论之后定稿;²⁷到了4月7日,吴

25. RJ19650115(RJB09)。

26. RJ19650116(RJB09)。

27. RJ19660222、0224(RJB12)。到了1966年4月13日,吴文藻又重新翻阅了(转下页)

文藻“上午就孝通写 Sorokin, Eisenstadt, Aron 和应用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学解释当前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著作选目加以核对纠错”(RJB13)。这些工作固然和“资产阶级社会学书单”之事有关,不过也的确符合吴文藻此前的学术兴趣。

其次是对于社会学的概论性书籍和前沿研究的广泛阅读。这些阅读逐渐收敛到了对于社会学经典的确定、集中阅读和翻译之上。

1963 年底,吴文藻开始阅读 G. P. Murdock 的 *Social Structure* 一书。²⁸ 1964 年 1 月,吴文藻阅读了由 Georges Gurvitch 与 Wilbert E. Moore 合著的 *Twentieth Century Sociology*²⁹ 一书和 Paul Radin 所著 *The Method and Theory of Ethnology* 一书(尤其关注最后一章关于理论的讨论)。1 月 21 日,吴文藻开始阅读巴特摩尔(Tom Bottomore)的《社会学》一书(RJB09),并在后来做了大量摘记。整个 1 月下旬,吴文藻除了有两个半天在为费孝通翻译的《中印边境》作校对,其余时间都在阅读巴特摩尔的这本书。

1964 年 11 月 13 日,吴文藻全天都在翻阅由盛震溯翻译出版的安德鲁·格兰特(Andrew Grant)的《社会主义与中间阶级》(*Socialism and the Middle Classes*)一书,尤其是“首尾两章”,即“众说纷纭的‘中间阶级’”和“劳工运动与‘中间阶级’”(RJB09)。从中应该可以看出吴文藻的兴趣所在。1965 年 1 月 15 日和 16 日,在校对工作之余,吴文藻还阅读了科塞的《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在日记中,他表示科塞“对 Mayo、Parsons 等人所作的批评很有道理”(RJB09)。

1965 年 2 月 28 日,吴文藻收到了商务印书馆寄来的杜威的《自由与文化》一书(RJB09),一直读到三月下旬,然后又开始阅读金斯伯格(Morris Ginsberg)的论文集,对于其中论述滕尼斯、孔德尤其是韦伯(Max Weber)的内容做了许多摘记。

在和世界社会学没有交流的前提下,吴文藻在大量阅读中独自确认了韦伯等学者在现代社会学历史中的经典地位并将其纳入编译计划。1965 年 3 月 23 日,吴文藻“开始编译 Max Weber”(RJB09),编译的文本是格特(H. H. Gerth)和米尔斯(C. W. Mills)选编的 *From Max*

(接上页)《逃避自由》这本书(RJB13)。

28. RJ19631230(RJB09)。

29. RJ19640102(RJB09)。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一书。³⁰ 吴文藻尤其重视其中关于民族、阶级和印度的部分。在接下来的四五月间,除了参加政协和民进的会议,吴文藻始终沉浸在翻译韦伯的工作之中。直到五月底,他才因为要查阅与“种姓”等概念有关的资料,又去阅读了《中印在拉达克的对抗》一书。这一翻译一直持续到6月25日,“政党节译完。第二编第六、七两章全部译完”(RJB09)。³¹

1965年七八月间,吴文藻阅读了金斯伯格书中关于韦伯等学者的几节,把其中论及“‘史学和社会学’关系一文”的内容做了摘记,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的著作也做了摘记。³² 8月,他还从费孝通那里借阅了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以及滕尼斯等人的作品,把金斯伯格的工作与雷德菲尔德的《小社区》(*Little Community*)³³ 和《农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等进行了比较阅读。

1966年春节期,吴文藻阅读了美国学者A. L. Strong的*China's Millions: The Revolutionary Struggles from 1927 to 1935*一书和美国期刊*Science & Society* 1965年夏季号里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的书评选编,又继续翻译了《韦伯社会学文集》,并就韦伯方法论中的核心概念应该翻译为“理解”“领会”还是“了解”等概念查阅《辞海》,以便最后确定译名(RJB12)。1月31日,吴文藻还在翻阅韦伯文集中“论权力结构”一章。当天下午,费孝通来访,讨论“资产阶级社会学名著编译计划”,同时给吴文藻带来了一批英文著作,吴文藻从中挑选出了米尔斯、帕森斯、巴特摩尔和乔治·索雷尔(George Sorel)等人的著作(RJB12)。2月,他开始阅读书籍,核对书目,为这一编译出版计划做准备,“竟日就Parsons和Mills的重要著作(书籍和论文)核对并补充。Mills的两部最流行的书已

30. “就Mills有关部分作摘记,……再就Mills有关书评补充摘记”[RJ19650413(RJB09)]。

31. 17日“上午在所恢复翻译韦伯书‘身份特权’节”,18日“上午在所翻译韦伯几行”,21日“午后翻译Weber几段,又就《社会学辞典》中有关authority之类条目摘记,以资比较”,22日“上午在所续就caste, pariah作摘记, 旋续译weber”,23和24日都是“续译weber”(RJB09)。

32. 到了7日,“竟日就Ginsberg论文集第三卷有关段落作摘记”(RJ19650802-0804)。吴文藻在1965年8月11日离京,在8月8日,他还“续就Ginsberg卷三有关历史学与社会学关系摘录几段”(RJB09)。

33. 1979年7月重读[RJ19790719、0723(RJB21)]。

明确。Parsons 的一时尚难确定”。³⁴到了 2 月 7 日,他“将急需几种(开了十种)杂志名单和建议购买两部辞典名称拟就交孝通”(RJB12)。从这一选题内容可以看出,吴文藻此时对于 20 世纪西方社会学经典流派及其新近的发展已经颇为熟稔。

1966 年 2 月 10 日前后,吴文藻开始阅读米尔斯。³⁵2 月 14 日,他开始整理米尔斯的著作目录。他从米尔斯编纂的 *The Marxists* 这部著作开始阅读,在后续时间里又仔细研读了《权力精英》和《白领》(RJB12)。在这期间,他还搜集汇总了帕森斯的书目。1966 年 2—6 月,吴文藻的大部分学术阅读都与帕森斯、默顿和米尔斯等学者有关。4 月 8 日,他拟定了关于帕森斯的翻译计划。4 月 11 日,他又拟定了关于默顿的翻译计划。³⁶到了 12 日,他“续就 Merton 和 Parsons 的纷歧作比较并对 Parsons 的权力论作些摘记”(RJB13)。

吴文藻在这一时期逐渐读完了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社会系统》等著作,尤其对于后者做了精读,形成了关于帕森斯和默顿的学术评介文章。这些阅读颇具前沿性。例如,他在 2 月 21 日记录到:“竟日就 Parsons 访苏后观感以及苏联哲学工作者眼中的美国社会学,看完后作些摘记”(RJB12)。这一阅读的背景是 1964 年帕森斯应苏维埃科学院的邀请访问苏联,并作关于美国社会学的系列演讲。可见,吴文藻在此时的阅读已经非常接近于国际社会学发展的前沿。

6 月 22 日,吴文藻继续在家中读与帕森斯有关的资料,“就书评或杂志论文中涉及批评 Parsons 的行动论和平衡论的(工作)作摘记”;26 日,他重又回到帕森斯,阅读了“英国社会学杂志上载评 Parsons 的社会学理论系统……的文章并作摘译”(RJB12)。

费孝通此时在阅读与弗洛姆有关的著作。5 月 2 日,费孝通给吴文藻送来了自己写下的关于弗洛姆新书 *Beyond the Chain of Illusion* 的中文简介。次日,吴文藻看完后把自己的意见交还给了费孝通。

34. 1966 年 2 月 4 日,“上午专就 Sorel 及其《暴力论》看些有关材料并作摘记”;8 日“上午查《辞海》有关‘暴力’,‘威力’,‘武力’,‘强权’等词拟就英文 violence, force, wright, power 等词确定中文译名”[RJ19660201(RJB12)]。

35. “在家续看 Mills 书编者所写导言,开始作些摘记”[RJ19660210(RJB12)]。

36. “续看 Parsons 论青年一文。下午赴所取杂志就 Robert K. Merton 的著作翻译计划拟出初稿”(RJB13)。

吴文藻不仅关心社会学的前沿发展，对于早期社会科学也十分重视。1966年8月16日，吴文藻“上午学毛著两小时后，即返家续看‘论文化表格’并摘记”（RJB13）。到了8月21日，吴文藻还在“竟日摘录有关早期社会学资料。主要利用 Bottomore 和 Randel 合编的书。未按年代顺序列出马克思的主要著作，又根据 Ginsberg 摘早期孔德、斯宾塞、马克思等人书目”（RJB13）。

这些阅读记录清楚表明，吴文藻通过在60年代的学术阅读，已经对于国际范围内的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的各个流派、经典思想家和重要的前沿著作都有了较为全面的把握。他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关注到了马克斯·韦伯，不过当时只是将其作为德国文化社会学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虽然感兴趣，却并未多加关注（吴文藻，2010a：150）。在60年代，显然是出于大量的阅读，他敏锐感知到了韦伯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吴文藻对于帕森斯的兴趣有其个人的历史渊源，也和当年建设燕京学派的努力有关系。1936年，他在代表燕京大学参加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大会时，就结识了帕森斯。两人由于对于韦伯有着共同语言而“很谈得拢”。1945年，吴文藻访美参加太平洋学会年会，会后拜访美国各大学时再度拜会了帕森斯，发现此时帕森斯“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声望越来越高，比我1936年初见他时大不相同”。帕森斯此时也在主持一项区域研究计划，正和吴文藻当时在中国所主持的区域研究工作不谋而合。事实上，吴文藻此次访问美国大学的重要目的之一是“考察美国大学里推行的‘区域研究’计划”。³⁷有了这两次前缘，在纯知识的谱系之外，吴文藻对于韦伯、帕森斯、米尔斯等学者们的理解和重视也就有了更具体的背景。

（三）边政学的实践：区域与边疆研究

1959年5月，吴文藻接到了搜集与整理和中印边界以及印度研究相关资料的任务。³⁸在他这一时期的学习笔记本和日记中，印度研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从吴文藻的生命史来看，这是一个让他感到非常重要的研究机遇。首先，从20世纪20年代写作《民族与国家》一文开始，再到30年代写

37. 以上3次引文皆来自中央民族大学藏吴文藻档案中《吴文藻综合材料》第63页。

38. 参见吴文藻1959年5月—1961年2月的学习笔记本（国际部分）和日记（RJB03，RJB04）。

作《蒙古包》和 40 年代写作《边政学发凡》，边疆和民族研究是他一直都非常重视的研究领域。这与他的“社会学中国化”设想也有关系。1936 年，吴文藻(2010b)在《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一文中曾提出要用社区研究的方法对中国的不同地域展开研究，然后加以比较。这是他在《社会学丛刊》的总发刊词里提出的建设中国“比较社会学”计划(吴文藻,2010c)的具体实施形态。在这一计划中，对于边疆民族地区的研究显然是重点之一。

其次，对印度的研究兴趣还和吴文藻的生命史交织在一起。1943 年 2 月至 4 月，吴文藻参加“中国文化代表团”访问印度，考察了印度的民族和宗教问题。他本人还到大吉岭单独访问了锡金，深入了解西藏边境的情况。回国后，吴文藻撰写了报告《印度的社会与文化》。从此，他对于印度的研究和兴趣一直没有停止。

出于以上原因，吴文藻在接到与印度研究有关的任务时自然非常重视。³⁹虽然他的《辞海》条目写作任务包括南亚和东南亚整个区域，他也相应阅读了如《沿湄公河而上》等著作，但是与印度相关的部分还是成为他重点关注的对象。例如，1961 年 1 月 4 日，“下午在家工作，以印度支那部分为重”(RJB05)；1 月 5 日，“上午到所查阅 1961 年⁴⁰下半年《人民日报》关于印度政治报道的有关材料，如锡克人、阿萨姆人、孟加拉人等”(RJB05)；1 月 6 日，“上午到所将锡克人条稿改写”(RJB05)；1 月 10 日，“继续搞印度资料”(RJB05)。在这项工作中，为了撰写词条，他开始阅读或重读与印度有关的书籍。例如，1 月 11 日，“重看尼赫鲁《印度的发现》书中论‘孟加拉的英国式教育’一节并与毛主席的言论做比较。改写孟加拉人条并为旁遮普人搜集材料”(RJB05)。一直到 1 月 15 日，他还在“核对印度材料，重看尼赫鲁《印度的发现》”(RJB05)。⁴¹在这期间，费孝通连续多日到他家里讨论条目的编写。19 日，吴文藻写完了与锡金和不丹有关的条目。21 日，他开始阅读与种姓制度有关的

39. 1962 年 7 月 10 日，外交部来人见吴文藻和潘光旦、费孝通，提出对于中印边界问题的研究要具体化。这一天的日记中，吴文藻特地用红笔写出“七月”，并用红笔对这一日记做了重点标记。13 日下午，吴文藻到费孝通家里看了由后者拟定的“中印边界问题研究计划稿”(RJB06)。

40. 此处应为笔误，实则应为 1960 年。

41. 吴文藻在 1962 年 3 月 22 日又重读该书以对费孝通的工作做出校对，1962 年 5 月 1 日他还在读此书(RJB06)。

材料并撰写辞目。29日,他阅读了希腊人类学家彼得王子(Prince Peter)关于中印交界中段的文章,以便为写作辞目做准备。到了2月,他一直在阅读与印度有关的著作,包括苏联学者格·格·科托夫斯基等人所著《东方国家的土地关系》中的印度一章和冯承钧翻译的《占婆史》一书。即使在《辞海》的工作转移到非洲以及澳洲和拉丁美洲部分之后,他还依然在阅读与印度有关的文献。⁴²

这一时期,吴文藻的阅读不仅局限在国内翻译过来的著作,也包括国外新出的英文著作。1961年5月,吴文藻接到了研究中国和巴基斯坦边界问题的研究题目(RJB05)。在这一背景下,他的阅读逐渐集中于和坎巨提有关的资料。5月27日,他开始阅读两本英国人写的游记,分别是 Barbara Mons 的 *High Road to Hunza* 和曾担任过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探险家 Eric Shipton 写的 *Mountains of Tartary*; 6月17日,他又读了 P. T. Etherton 的 *In the Heart of Asia* 一书。⁴³ 6月21日,他读到了拉铁摩尔新出的 *Pivot of Asia* 一书,并在后续几天里把该书附录中关于1895年英俄瓜分帕米尔的“边界委员会”的材料翻译成了中文。到了9月和10月,他阅读了斯坦因的《西域考古记》和 *Ancient Khotan*⁴⁴, 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⁴⁵ 和 *Through Asia*⁴⁶, T. E. Gordon 的 *The Roof of the World*⁴⁷ 以及 W. M. McGovern 的 *The Early Empires of Central Asia*⁴⁸, 等等。

除了国外的资料,吴文藻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帕米尔的资料也有所涉猎。例如,清代胡祥谔和新疆政务有关的《帕米尔辑略》一书,《清史稿》中关于坎巨提的章节,清人袁大化修的《新疆图志》中的相关内容⁴⁹,清代学者徐松的《西域水道记》⁵⁰,清人尼玛查的《西域闻见录》⁵¹,

42. 例如,1961年2月27日和28日两天,吴文藻在日记中记录到,在完成了非洲部分后,他又开始补充印度部分的材料,对“克什米尔人”和“锡克人”两个词条“重加研究”。整个三月份,吴文藻也一直都在研究印度相关的辞目(RJB05)。

43. 1962年3月16日和4月25日,吴文藻继续查阅使用该书并翻译了其中部分段落(RJB06)。

44. RJ19611114、1208、1209、1210(RJB05)。

45. RJ19611013、1026(RJB05)。

46. RJ19611101、1125(RJB05)。

47. RJ19611107、1110、1111(RJB05)。

48. 5月12日重新阅读并节录部分段落[RJ19620211(RJB06)]。

49. RJ19610909、0911(RJB05)。

50. RJ19611023(RJB05)。

51. RJ19611024(RJB05)。

李光廷的《汉西域图考》⁵² 以及王彦威主持纂辑、王亮整理的《清季外交史料》⁵³。这些阅读范围和眼界与当年他在《边政学发凡》一文中所提出的研究主张颇有相通和承续之处。

基于以上种种努力,1961 年底,吴文藻和吴丰培、胡先晋、费孝通四人共同拟定大纲,计划以五章篇幅编写《坎巨提史志资料汇编》以及作为附录的《帕米尔兴都库什地区(河姆印度两河之间)民族情况资料汇编》。吴文藻是这个编写计划总的负责人。1961 年 11 月 20 日,吴文藻上午在研究所和三人讨论,“下午在家将大纲修改,增入细目。对第一章地理形势材料初步编排就绪”(RJB05)。

1962 年后,吴文藻继续在这一领域深入阅读,阅读书目包括 A. G. A. Durand 的 *The Making of a Frontier*,⁵⁴ Barton Sir William 的 *India's North West Frontier*,⁵⁵ 汤普逊的《中世纪社会经济史》,⁵⁶ 王忠的《松赞干布传》,⁵⁷ 拉铁摩尔的《亚洲的决策》,椿园的《外藩纪略》,⁵⁸ Middleton 的 *Britain and Russia*, 沙畹的《西突厥史料》,⁵⁹ V. Barthold 的论文集,张星烺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⁶⁰ Arnold J. Toynbee 和 Kenneth P. Kirkwood 的 *Turkey*, 姚枏编译的《南洋史地丛考》,⁶¹ 巴尼的《印度尼西亚史》,⁶² 林惠祥翻译的《苏门答腊民族志》,⁶³ H.W. Bellow 的 *The Races of Afghanistan*,⁶⁴ Olaf Caroe 的 *The Pathans*,⁶⁵ 恩格斯的《家族、私有制及国家的起源》,⁶⁶《隋书》《新唐书》,⁶⁷ 等等。当然,他也非常关注在边疆研究方

52. RJ19611130(RJB05)。

53. RJ19611125、1127(RJB05)。

54. RJ19620302、0310(RJB06)。

55. RJ19620312、0425(RJB06)。

56. RJ19620425-0429、0506-0509、0605(RJB06)。

57. RJ19620505-0506(RJB06)。

58. RJ19620523(RJB06)。

59. RJ19620621、0708、0715、0719(RJB06)。

60. RJ19620904-0925、1212、1213、1218(RJB06)。

61. RJ19621219(RJB06)。

62. RJ19630107(RJB06)。

63. RJ19630215、0414、0415、0416(RJB06)。

64. RJ19630413、0419、0420、0422、0423、0514(RJB06)。

65. RJ19630415、0418、0420、0422、0518、0521(RJB06)。

66. RJ19630424、0428(RJB06)。

67. RJ19630427(RJB06)。

面的前沿著作。1964年6月,在翻阅拉铁摩尔的《边疆历史的研究》论文集时,吴文藻发现在其《社会史》一编中有好几篇论文是近著,并且他没有读过,于是认真阅读多日。⁶⁸

所有这些阅读,吴文藻都一一核对中英文的概念、地名、地理位置,做摘录、笔记和翻译,并与费孝通等人反复讨论和校对。1963年9月,费孝通在他的帮助下已经完成了《帕米尔及瓦罕走廊史地资料汇编》,吴文藻接下来开始校对这些资料。⁶⁹即使在这一时期,吴文藻也是以学术阅读来保证校对的准确性。例如,1963年8月25日,他在日记中记到:“上午看孟德斯鸠《法意》,查出严译 caste 为‘喀斯德’,并非‘喀士德’”(RJB06)。

或许是作为对上述研究的补充,吴文藻在这一时期还对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历史与民族学理论讨论充满了兴趣。他在60年代的阅读还包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 *Civilization on Trial* 一书⁷⁰及其相关书评,罗伯特·路威(Robert. H. Lowie)的《民族学公论史》(*The History of Ethnological Theory*),弗思(Raymond Firth)的《社会组织因素》(*Elements of Social Organization*),⁷¹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的《历史学、心理学和文化》(*History, Psychology and Culture*),⁷²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 *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等等。

1964年9月18日,吴文藻开始阅读阿拉斯太尔·蓝姆(Alastair Lamb)的《中印边境》一书的英文版。这一阅读应该是费孝通后来做该书翻译的前奏。10月,吴文藻继续阅读该书。19日,他和费孝通商议,“作Lamb书摘要以供外(交)部选择事”。⁷³商议之后,两人应该是做了分工。21日,费孝通送来了自己拟写的《中印边境》一书的提要。吴文藻在21日和22日读完提要并做出修改后,费孝通又将其誊写清楚,吴文藻在23日读完费孝通的誊清稿后,“回外交部第一亚洲司信”。⁷⁴由此可

68. RJ19640617-0619、0623、0630(RJB09)。

69. RJ19630926(RJB09)。

70. RJ19630915、0916(RJB09)。

71. RJ19630916(RJB09)。

72. RJ19630918(RJB09)。

73. RJ19641018、1019(RJB09)。

74. RJ19641021-1023(RJB09)。

见,本书的翻译是应外交部之约,服务于当时国家的需要。11月16日,吴文藻赴费孝通家里取回该书以及译稿,重读并开始校对译稿。至1965年4月,吴文藻完成了整本著作的校对。⁷⁵时至1966年3月3日,吴文藻和费孝通的两个翻译都有了结果,“近午孝通送来两本书。一是保林《不要再有战争》中译本。我曾翻译其中几章。二是蓝姆《中印边境》一书,我曾负责从头到尾逐字逐句校阅译文”(RJB13)。

除了印度之外,由于在日本工作的经历,吴文藻还对日本研究非常感兴趣。他在60年代还阅读了日本著名东洋史学家和田清所著的《东洋史》⁷⁶以及京都学派代表史学家宫崎市定所著的《东洋的朴素主义民族与文明主义社会》⁷⁷等著作。

五、重建史视野的确立:70年代的学术阅读

1971年,同费孝通等人回到北京后,吴文藻的学术阅读也得以重新开始。总体来说,他在70年代初期的阅读兴趣依然集中在印度研究方面,阅读书目包括潘尼迦的《印度简史》,辛哈等人的《印度通史》,帕拉纳维达纳的《锡兰简明史》,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印度对华战争》,汤因比《历史研究》中关于佛教和伊斯兰教的部分以及《高级印度史》和《印度通史》,等等。随着时间推移,他的阅读呈现出越来越清晰的特征。

(一)从翻译到阅读:取向明确的学术兴趣

吴文藻在20世纪70年代的阅读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由翻译和校对工作的需要带来的学术阅读。例如,1972年4月13日,商务印书馆的工作人员来访,“询问摩尔根《古代社会》原书版本事并提及要知道今天美国人类学对摩尔根的评价”(RJB13)。吴文藻在随后几天找出摩尔根的材料,开始重新阅读。1973年3月14日起,吴文藻开始为商务印书馆的摩尔根《古代社会》新版本做校对工作(RJB18)。3月下旬,吴文藻等人的翻译和校对已经转向《世界史纲》,他开始阅读相关的学术作品。1974年5月17日,他开始阅读David L. Snellgrove和Hugh E. Richardson合著的*A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一书。1974年6月11日和23日,吴文藻重新读了韦伯论种姓制度的部分章节。此类阅读一直持

75. RJ19650408-0412(RJB09)。

76. RJ19630906(RJB09)。

77. RJ19630916(RJB09)。

续到 70 年代末。1977 年 2 月 13 日,为了准确翻译原始社会史的一些概念,吴文藻开始阅读库朗热的《古代城市》一书,理解“家、族、部落、城邦四级社会的发生与发展”(RJB20)。1977 年 6 月 22 日后,为了翻译 Davidson Basil 的 *Africa in History* 一书,吴文藻专门阅读了杜波依斯的《非洲》一书,认为“材料丰富,如决定翻 Davidson,此书是必不可少的参考”(RJB21)。到了 7 月份,应该是在他的推荐下,翻译组决定翻译此书,题目定为《非洲史略》。

其次,由于个人生命史和时政,吴文藻此时的阅读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20 世纪 40 年代,吴文藻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里工作时曾负责外交工作,所以他一直都对外交和国际政治方面的著作非常重视。这一点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显示出了迹象。⁷⁸ 1972 年 3 月,他在读完伊东峻一郎写的《东条英机传》后评价:“写得不好。对当时时事背后没有分析能力,译文也不好”(RJB13)。1972 年下半年,他阅读了斯诺出版的新书 *Red China Today*⁷⁹,随后又读了 W. A. Douglas Jackson 的《俄中边境》(*The Russo-Chinese Borderlands: Zone of Peaceful Contact or Potential Conflict?*) 等著作。1973 年三四月间,他阅读了苏联朱可夫将军的回忆录《回忆与思考》一书,然后阅读了土耳其作家伊·巴兹纳所著的《一个德国间谍的供词》。1973 年底,吴文藻阅读了《史迪威事件》⁸⁰ 和《布拉格之春》。1974 年三四月间,他阅读了哈尔伯斯坦(David Halberstam)的《出类拔萃之辈》。⁸¹

1973 年下半年之后,他在这方面的阅读就更多了。包括《阿登纳回忆录》、Klaus Mehnert 的 *China Returns*、布兰登的《美国力量的收缩》、基辛格的《选择的必要》、阿登纳和戴高乐的《论中苏问题》《七十年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基辛格》以及布热津斯基⁸² 等学者的著作。此外,他对于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兴趣依然未减,阅读了《亚洲边疆》⁸³ 以及《锡金与不丹》等书。

1974 年 2 月,在“批林批孔”“批克己复礼”的浪潮中,吴文藻对照

78. “续看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书中关于传教士章”[RJ19641028(RJB09)]。

79. RJ19721124(RJB13)。

80. “材料很丰富,参考不少中美官方文件”[RJ19731202(RJB18)]。

81. RJ19740326、0420(RJB18)。

82. RJ19770818、1117、1127、1201(RJB21)。

83. RJ19730726(RJB18)。

《礼记》等书翻阅了韦伯《儒教与道教》中关于儒家“礼”的概念的部分。⁸⁴同年 7 月,他阅读了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⁸⁵《中国文化要义》⁸⁶和辜鸿铭的《春秋大义》⁸⁷等著作。

第三,关于社会学整体发展的阅读与思考。1976 年 9 月,曾经请吴文藻参与编写“民族学”主题词的“七四八工程”(图书资料电子检索系统)团队,又请他编写“社会学”主题词。⁸⁸吴文藻对于社会学的发展一直都很关注。1973 年 3 月,他开始翻阅 *Sociology as Social Criticism* 以及帕森斯在 1971 年新出版的 *System of Modern Societies*。1973 年 7 月 14 日,吴文藻在阅读米尔斯的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一书,尤其关注其中关于拉扎斯菲尔德的“抽象经验主义”的一章(RJB18)。由此可见,“七四八工程”团队的请求正中他的下怀,让他可以有机会整理自己阅读的社会学书目和相关知识。1977 年 2 月 26 日,吴文藻开始翻阅由布鲁姆和塞尔兹尼克合编的《社会学》⁸⁹以及巴特摩尔所著《社会学》等著作,也参考默顿和科塞等人的工作,到后来又回溯到帕森斯,⁹⁰从学派开始,为编写社会学词组做准备。他既关心社会学的整体发展图景,也非常重视一些重要的学者如帕森斯和米尔斯等人的工作。1977 年 9 月 10 日,吴文藻在阅读科塞(L. Coses)编写的 *Masters of Sociological Thought* 一书(RJB21)。同一天,他开始阅读法国社会学家 Michel Crozier 的 *The Stalled Society* 一书,并在日记中称赞该书“较新颖”。⁹¹

第四,他延续了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兴趣,主要关注知识分子问题。1974 年年底,他找出巴特摩尔的著作 *State and Society*,查阅了其中关于

84. RJ19740212-0213(RJB18)。

85. RJ19740705(RJB19)。

86. RJ19740714(RJB19)。

87. RJ19740707(RJB19)。

88. RJ19760907(RJB20)。

89. 该书英文版为 Leonard Broom and Philip Selznick, 1963. *Sociology: A Text With Adapted Readings*. Harpar & Row(参见 RJB20)。1979 年 3 月 2 日,吴文藻重新阅读此书,尤为关注其中的“现代化部分”,4 月 4 日和 5 日,他又重新阅读了其中关于种族和族群的部分(RJB21)。

90. “翻阅由 Parsons 引起的一大堆社会学概念,选出其中有广泛影响者列入”[RJ19770304(RJB20)]。

91. 到 12 月 24 日又读此书。1978 年 8 月 15 日,吴文藻重读此书关于权力的一章,表示“比较抽象,不易弄懂”(RJB21)。

知识分子的一节，“特别注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西方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先查阅中世纪大学的贡献”（RJB19）。1977年5月，吴文藻阅读了罗素《西方哲学史》中关于洛克的一章，7月，他又翻阅了巴特摩尔著作中关于知识分子的论述。1979年4月25日，他开始阅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下册，尤其关注科学革命的部分，一直到6月25日，他的阅读又重新回到知识社会学问题（RJB21）。

第五，关注人类学的新进展。1975年8月5日，吴文藻开始阅读由利奇（Edmund Leach）所写的 *Claude Lévi-Strauss* 一书（RJB19），并由此开始关心列维-施特劳斯的工作。1979年4月26日，他把《理论社会学》一书中的“结构社会学”与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人类学”对照阅读，发现后者并不容易理解（RJB21）。从该年5月到9月以及1980年，吴文藻不断重新阅读利奇的这本著作。⁹² 这些阅读促成他后来在国内最早推介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1983年，他安排自己的学生王庆仁翻译此书，并在翻译完成后由自己来校对，还为其写作了序言（吴文藻，1986）。

最后，出于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关心的发展，吴文藻对于现代化和发展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6年5月7日，吴文藻在某期刊上读到了对于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介绍，颇感兴趣，就此作了摘记（RJB20）。这一阅读开启了他在此后将近十年间对于丹尼尔·贝尔的长期阅读兴趣。1976年11月，吴文藻阅读了 John Kenneth Galbraith 的 *The Affluent Society* 一书（RJB20）。1978年8月，吴文藻再读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有关的材料，关注其中对于人类社会进程发展的讨论。⁹³ 他对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充满了期待，认为发展问题值得研究。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成为他在此后几年的常读书目。1978年10月27日，他开始阅读《理论社会学》一书中关于“未来”的一些章节，更进一步开始了解“未来学”的相关研究（RJB21）。

（二）海外交流带来的新视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中美交流逐渐恢复，当年留在海外的朋友、同学、学生纷纷回国访问。由于吴文藻和冰心各自在社会科学界和文学界的地位，他们家一度成为中国对外学术和文化交流的一个

92. RJ19800223（RJB22）。

93. 到年底重读此书时，吴文藻主要关心“关于未来的看法那几节”[RJ19781129（RJB21）]。

窗口。⁹⁴ 从这一时期开始，吴文藻的阅读受到很多来自海外交流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分为三种：

首先是通过与来访学者之间的交流了解海外学界。吴文藻非常关心海外社会学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发展。这些交流使得中国社会学在重建时期的学术视野有了极大的拓展。

在尼克松访华前，吴文藻就已经见过他的两位学生，1964 年 5 月 4 日见到了黄迪(RJB09)，1971 年 11 月 5 日见到了杨庆堃(RJB13)。1972 年 8 月 16 日，杨庆堃再度来访，吴文藻和费孝通见了面，谈了“整个上午”(RJB13)。在尼克松访华后，更多学者来访。1972 年 4 月 21 日，吴文藻会见了美国康涅狄格大学人类学系主任诺尔曼·昌斯(Norman Chance)教授，交流两国少数民族的相关事宜和政策(RJB13)。同年 6 月 17 日，吴文藻见到了老朋友费正清夫妇，6 月 28 日，见到了许烺光夫妇。9 月 6 日，他见到了老朋友拉铁摩尔，两人畅谈了一个下午(RJB13)。此后，吴文藻又专门阅读了拉铁摩尔的《中国简史》(*China: A Short History*)⁹⁵ 一书。

此种交流对于吴文藻本人的学术阅读和翻译工作都有很大的帮助。1973 年 1 月 3 日，吴文藻接待了来自夏威夷的美籍华人代表团，其中有历史学教授郭颖颐。吴文藻与之谈及自己正在翻译的《世界史》，郭颖颐向他介绍了 McNeill 在 1963 年出版的《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史》一书。1 月 5 日，吴文藻将此书的第二版借来，在翻译工作之余开始阅读。1 月 19 日，吴文藻将本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做了比较，“开始翻阅 McNeill《西方的兴起》第一版并与第二版比较，……注意 1789 年法国革命以来的世界史即近代这一部分。本书论述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特别法国革命)较详。思想革命稍逊。内容比 Hayes 书略得多”(RJB18)。整个 1973 年 1 月份，吴文藻都在读这部世界史著作，并把它与其他的世界史著作相比较。

这样的交流一直持续到重建时期，吴文藻经常会将交流内容与阅读内容相比较，这为社会学的重建提供了广泛而深入的学科视野。例如，1975 年 4 月 4 日，吴文藻等人接待了日本学术文化代表团部分团

94. 由于主题所限，本文将只介绍吴文藻见过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学者，略去他会见的许多文学界人士。

95. RJ19721001(RJB13)。

员的访问,来访者包括长尾雅人和中根千枝等(RJB19)。为了接待中根千枝,吴文藻专门阅读了她写的《日本社会》一书。会后,吴文藻又读了她的《日本文化人类学》一文和《日本社会》一书(RJB19)。1979年11月6日,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与人口学家戈尔茨坦(Sidney Goldstein)教授来访。吴文藻上午与戈尔茨坦会谈,下午回家即把同戈尔茨坦的谈话内容与美国社会学的教材相对应,做出笔记和摘记(RJB21)。

此外,1979年11月20日到21日,吴文藻在民族学院参加和日本民族学代表团的会谈。日本代表团成员包括梅棹忠夫和铃木二郎等人。会上日本学者报告了关于非洲的研究和对日本文化起源的研究。1980年,吴文藻还接待过倪维德⁹⁶和香港中文大学的谢剑⁹⁷等学者。1980年底,他接待了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孔迈隆(Myron L. Cohen),讨论了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和现代化问题以及孔迈隆在中国展开实地调研的计划。1983年1月18日,沙博理(Sidney Shapiro)来访,吴文藻和他主要讨论了中国的犹太人问题。1983年2月11日,吴文藻和费孝通会见了法国著名的结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莫里斯·古德利尔(Maurice Godelier)。1984年1月17日,普林斯顿大学的马瑞翁·利维(Marion J. Levy)经由瞿同祖介绍来访。

这些来访友人或者学生为吴文藻等人提供了许多海外学界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帮助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其次,此种对外交流还产生了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即许多来访学者后来给吴文藻寄来了许多的书籍和资料。这些直接影响了他和费孝通等人的学术阅读和学术视野。

1972年11月29日,杨庆堃给吴文藻寄来了英文学界的新书(RJB13)。此后,吴文藻在日记中所写下的收到杨庆堃寄来书与书目的记录至少有4次,包括1979年给他寄来最新的社会学刊物(RJB21)。1973年8月21日,吴文藻见到了老朋友顾毓琇(一樵)。29日,吴文藻夫妇与顾毓琇再次见面,借此了解海外友人和学界的动态,也谈了自己

96. 1980年4月24日、26日见。倪维德还在9月28日寄来了Marvin Harris关于文化唯物主义的著(RJB22)。

97. 1980年6月6日见。谢剑在1980年7月22日寄来一本纪念摩尔根的论文集,在1981年寄来自己的著作《客家》,在1982年2月寄来自己的新著,此后又多次寄送书籍(RJB22、RJB23)。

正在做的翻译(RJB18),顾毓琇提及丘吉尔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并在回到美国后,立即为吴文藻购买寄送了这套书。1975年,吴文藻收到了该书全部六册。⁹⁸

1973年2月8日,吴文藻收到了燕京大学毕业生,曾经同在东京共事、时任斯坦福大学教员的老友刘子健寄来的巴特摩尔1966年的新书 *Elite and Society*,“一口气看只存倒数第二章”(RJB18),第二天继续将此书读完。刘子健此次寄给吴文藻的书籍中还有三本马克斯·韦伯的著作。2月19日,吴文藻翻阅之后记录:“只有一本关于法律是新英译的。另外两本系廉价重版”(RJB18)。由此可见,吴文藻此时对于韦伯的英译本是非常熟悉的。21日,吴文藻开始阅读 *Max Weber On Charisma and Institution Building* 一书。他这一次的阅读兴趣集中在韦伯的天职论上。22日,吴文藻记载:“上午到班继续翻阅 Weber 的天职论。特别就有关宗教研究部分多置注意。晚将以前遍 Weber 的著作卡片作些补充备查改”(RJB18)。这应该是中国学界比较早的接触韦伯关于“天职”的记录。23日,吴文藻又收到了巴特摩尔的《社会学》修订版,随即开始阅读,并将其与旧版相比较,把增添的部分作了笔记(RJB18)。这一阅读一直持续到月底。到了3月1日,应该是在此前受到吴文藻推荐而阅读韦伯“天职论”的费孝通来到办公室,专门和吴文藻讨论了韦伯关于天职的理论(RJB18)。

1973年6月28日,吴文藻收到美国友人劳伦斯·休斯(Lawrence Hewes)寄来的17本社会学著作(RJB18)。⁹⁹ 这批书目中有多本吴文藻

98. RJ19750124_0225(RJB19)。

99. 书目如下:

- (1) Almond & Verba: *Civic Culture*. The Little, Brown serie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1965.
- (2) Bendix & Lipset (eds.): *Class, Status, and Power,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Free Press, 2nd, 1966.
- (3) Berelson & Steiner: *Human Behavior* (Shorter Edition). Harcourt, Brace, 1967.
- (4) Blau, Peter M. & Duncan, O.D.: *The American Occupational Structure*. John Wiley, 1967.
- (5) Brown, L. & Selznik, P.: *Sociology*. Harper & Row, 5th.ed., 1973, rep. of 1955 ed., with Manual to accompany, 1973.
- (6) Etzioni, A.: *The Active Society*. Free Press, Paperback, ed., 1971.
- (7) Gans, Herbert J.: *The Levittowners: Ways of Life and Politics in a New Suburban community*. Vintage Bks., 1967.
- (8) Garfinkel, H.: *Studies in Ethnomethodology*. Prentice-Hall, 1967. (转下页)

已经读过,可见他当时对于海外学界的熟悉程度。1975年10月25日,吴文藻收到了友人寄来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出版目录,对于其中记录的关于种族问题以及社会学、民族学和社会心理学这几门学科的新书,他都一一做了摘录,“以备日后借阅”(RJB19)。1976年9月,吴文藻收到了来自美国的一位女教授赫耳姆斯(Helmes)寄来的一包社会学书籍,共有21本之多(RJB21)。

1978年11月1日,吴文藻收到友人寄来的几本书籍,其中包括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E.F. Schumacher的 *Small is Beautiful* 和麦克阿瑟的传记等。吴文藻随即开始阅读贝尔的著作,随后几天又读了 *Small is Beautiful*。¹⁰⁰

1979年9月,田汝康应利奇(Edmund Leach)之邀去剑桥访学,行前专门来见吴文藻,答应为吴文藻寄送利奇作品(RJB21)。到了80年代,除了杨庆堃、谢剑和倪维德之外,其他海外友人和学生也都在不断地给他寄送书籍和资料。例如,从1982年12月16日到1983年12月31日,吴文藻7次收到戴秉衡寄来的书籍,主要为社会心理学方面的著作,还有三本弗洛姆(Eric Fromm)的著作和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英译本。1983年4月14日,哈佛大学人类学系的张光直教授来信,应吴文藻的要求,给他寄来了该系当时所开课程的课程表(RJB23)。

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他和费孝通等人的学术阅读,拓宽了他们的学术视野。

最后,对外交流还带回了许多曾经的历史资源,为重建带来了许多

(接上页)(9) Goffman, Erving: *Asylums: 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 New York Anchor Bks, ed, 1961.

(10) Goode, William J.: *World Revolution and Family Patterns*. Free Press, 1971.

(11) Kuhn, Thomas S.: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enl. 2nd. Ed., 1970.

(12) Lazarsfeld & Rosenberg (eds.): *The Language of Social Research: A Reader in the Methodology of Social Research*. Free Press, 1955.

(13) March, James G. (ed.): *Handbook of Organizations*. Routledge, 1965.

(14) Merton, Robert K.: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enl. ed. 1968.

(15) Mills, C. Wright: *The Sociological Imagination*. Oxford, Up. 1959.

(16) Parsons, Talcott: *The Social System*. Free Press, Paperback, 1964.

(17) Stouffer, Samuel A.: *Communism, Conformity and Civil Liberties*. John Wiley, 1966.

100. 1979年3月底到4月初,吴文藻在病中重读了此书。参见吴文藻1979年3月31日、4月1日和4日的日记(RJB21)。

思路。这使得对外交流有了更加明显的服务于重建的意味。1973 年 7 月 10 日,吴文藻和冰心一起会见了来访的老朋友林迈可、李效黎夫妇,两家人谈到中午才散(RJB18)。1983 年 5 月 30 日,吴文藻与再度来访的林迈可夫妇会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主题就是中美关系和两国大学间的留学生交流。

总之,这些对外交流给中国的学者们带来了大量的信息,既包括学术研究方面的信息,也包括学科建设方面的建议和设想。毫无疑问,这些信息扩展了吴文藻等人的学术视野,丰富了社会学重建时期的学术资源,是学科重建的基本背景和重要辅助。

六、学术共同体的承续

吴文藻在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呈现出一个强烈特点,即其阅读并非个人性的,而是共同体性质的。无论是翻译和校对工作的进行,还是围绕着共同阅读展开的讨论与互动,都呈现出了这个特点。这个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成员,在 60 年代是他和潘光旦、费孝通,到 70 年代变成了以他和费孝通、林耀华等人为核心,还包括瞿同祖和海外的杨庆堃、黄迪等人。这个学术共同体带有当年燕京学派的强烈色彩,因此可以被视为当年燕京学派的延续,并且是中国社会学恢复和重建的关系基础。

(一)一种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学术共同体

从 1955 年开始,吴文藻和潘光旦、费孝通等人共同生活在一个社区,彼此志趣相投,声息相通,患难与共,学术工作和日常生活紧密关联在一起,形成了一种首先是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学术共同体。

20 世纪 60 年代,和吴文藻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潘光旦与费孝通两人。在潘光旦去世之前,吴文藻每天除了记下自己的日常,通常还会记录潘光旦、费孝通和冰心这三人的行踪。潘光旦也经常会在日记里记下吴文藻来访、乘坐吴文藻和冰心叫的汽车进城或者三家人共同出游的记录。在潘光旦去世后,民族学院中和吴文藻来往密切的大多是他当年的学生一辈。到了 70 年代,吴文藻的日记中通常会记录冰心、他自己和费孝通一天的活动。

吴文藻和费孝通的关系首先当然是师生,不过在漫长的岁月中,两人之间早已经超越师生而成为相濡以沫的朋友关系。费孝通曾经深情回忆过吴文藻和他之间的此种渊源(费孝通,1996)。本文在吴文藻

日记中发现的另外一个案例足以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早已是一种生活共同体。

从1956年起至1966年5月26日,在这十年的日记中,每个月少则一次,多则三四次,吴文藻会记录下前往费孝通家里洗澡的事情。日记中的记录形式通常是“晚饭后费家洗澡”或“到费家洗澡”等。他在1964年阅读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一书,最初就是1月16日去费孝通家里洗澡时看到,到2月8日再度去洗澡时索性借走的。这些记录当然并不是他所有洗澡的次数,由于经常需要进城开政协会议或者民进会议,所以吴文藻和冰心也几乎会在每次进城时去特定的浴室洗澡。吴文藻到费孝通家里洗澡应该是定期和有规律的。1964年3月15日,吴文藻在日记中记录:“通知费家不去洗澡”(RJB09)。不去洗澡而需要通知,可见这是一个两家共同的习惯。吴文藻的女儿吴青在访谈中说,吴文藻和冰心当时所居住的和平楼208室洗澡不便,两位老人“迈进去很容易摔到”,¹⁰¹而费孝通家里的浴室既安全又比较大,所以前往住在附近的费孝通家里洗澡就成了费孝通和吴文藻等人共同的决定。

洗澡一事足见吴、费二人的密切关系。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例如,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吴文藻和冰心需要到楼下避震,疲惫时就到位于一楼的费孝通家中沙发上休息,“此后每遇有震忧,即出楼,一无信息,又回休息,如是多次”(RJB20)。

吴文藻和学生们的密切关系显然不止这些。例如,他前后奔走,帮助瞿同祖调回北京(孙飞宇,2025)。不过,这个共同体中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更多还是在学术研究的层面上发生的。

(二) 学术共同体及其自觉意识

从60年代编纂“三套丛书”开始,到“文革”期间潘光旦去世,再到吴文藻和费孝通、林耀华等人做翻译,最终到“文革”后恢复和重建社会学,在这30年的时间里,吴文藻和费孝通以及之前去世的潘光旦在学术上保持了亲密无间的合作。

如前所述,由于许多翻译工作、《辞海》条目的写作和“资产阶级社会学名著编译计划”等工作,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在一起做了大量的学术工作,几乎每天都有交流合作。例如,1961年1月16至18日,吴文藻连续三天在日记里记载费孝通到他家里来讨论“改写孟加拉人、旁遮普”
101. 2025年5月13日吴青访谈。

人、锡克人等三条”(RJB05);到了 23 日,费孝通又来到老师家里帮忙改写缅甸的条目;25 日和 27 日他又到家里帮忙改写越南各民族的条目;6 月 19 日,吴文藻“上午赴所看孝通拟件,校阅译件,清理部分资料。下午在家校阅译件,并与光旦校对月氏、小月氏、大月氏三个名称”(RJB05)。

在编纂《坎巨提史志资料汇编》时,吴文藻总体负责,同时不断为费孝通负责的第一章和第二章准备资料。费孝通每编写完一章,都会交由吴文藻校对。¹⁰²后来,吴文藻在为《中印边境》作校对时以及在翻译韦伯遇到困难时,都会“往访光旦商量”¹⁰³,还会请潘光旦校对润色译稿。¹⁰⁴潘光旦(2000:623)也在日记中记录下了这段两人就译文中的“疑难之点须相商榷,然后定稿”的日子。到了 70 年代,此种学术共同体的关系依然继续着。1974 年 5 月 13 日,吴文藻收到瞿同祖的来信,信中提出了“20 几个翻译中问题”,吴文藻帮他查出来一一解答,当天晚上,还请周觉良帮助核对(RJB18)。

这样的共同体合作并不仅仅局限在编译工作上。1962 年,费孝通写了《留英记》,吴文藻在阅读初稿后,约费孝通到家中谈自己的意见。¹⁰⁵费孝通写给英国书店的英文信件,也会请吴文藻修改润色。¹⁰⁶在重建时期,这一学术共同体的色彩更加鲜明,吴文藻花了大量的时间帮助新老学生们的学术工作。例如,1979 年,费孝通访美归来,吴文藻和冰心第一时间阅读了他写的《访美掠影》一文,提出了修改意见,并和他讨论了邀请海外华人学者回国讲学的事情。此外,吴文藻还给林耀华提供了关于列维-施特劳斯的信息,读了他所写的关于“新中国的民族学研究”等论文并提出修改意见;帮助陈观胜校对他翻译的英克尔斯(Alex Inkeles)的著作《社会学是什么》;¹⁰⁷校阅陈永龄和王晓义写的《二十世纪前期的中国民族学》一文稿件,等等。1978 年 7 月 22 日,吴文藻为《摩尔根以来的原始社会研究的发展简况》一文与黄淑娉和林耀华“谈足足两小时,开始感到气短即停,未及按页指出增删意见”(RJB21)。在

102. RJ19611104、1105、1223(RJB05)。

103. RJ19650310、0312、0406(RJB09)。

104. 如 RJ19620316 中记载:“访光旦请帮助改译稿”,19 日和 21 日晚,吴文藻又两度到潘光旦家里,“请帮助对译文润色”,“请帮改译稿”(RJB06)。

105. RJ19620629(RJB06)。

106. “为孝通改写给英国书店的英文信札。”[RJ19631227(RJB09)]。

107. RJ19800306(RJB22)。

当晚的日记中,他还记下了有待进一步查找资料以解决的问题。由于英文功底扎实,他还帮助费孝通、陈永龄、林耀华和李有义等人修改了许多英文稿件。例如,在1978年10月20日的日记中,吴文藻记录自己修改润色了费孝通的英文稿件。¹⁰⁸

这一学术共同体有着高度的自觉意识,即他们来自燕京大学,认同燕京学派的传统。1962年4月26日,费孝通来到吴文藻家中,“谈燕京社会学系发展史”(RJB06)。1964年1月4日,吴文藻专门整理、摘录了在燕京云南工作站工作过的同仁们在英美发表过的专业著作目录(RJB09)。1964年9月17日到10月17日期间,吴文藻“就写燕京事续作摘记”,10月8日,他又记录到:“在所续看关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材料”,这表明他在此前就已经在看相关的材料(RJB09)。他必定也和费孝通沟通过这一主题,所以会在11日写到:“孝通送有关洛克菲勒两本书来”(RJB09)。10月19日和24日,吴文藻还在继续阅读洛克菲勒的材料并做出摘记。

吴文藻及燕京学派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一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首先,从1934年7月吴文藻接任社会学系主任后,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的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在燕京大学的项目都需经由吴文藻办理。吴文藻和冰心在1936—1937年的环球游学中的许多日程和计划也都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安排和支持。¹⁰⁹其次,吴文藻在1938年底到达昆明后建立的燕京大学—云南大学研究站,据他所记,“研究经费部分即出之于该会拨款,由我负责主管”¹¹⁰,也就是说,他所主持的魁阁的学术工作,在相当程度上得到了该基金会的支持。第三,1944年底,吴文藻借由太平洋学会年会的机会访问美国,在该基金会的支支持下访问了美国一系列高校的社会学系和重要学者,以了解当时美国社会科学界的发展情况。所以,回顾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这一举动应该是他回顾燕京学派的一个部分。这表明,他认可这些工作的价值,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社会学中国化的工作和学生、同仁们的努力。

1982年,吴文藻还系统修改了燕大社会学毕业生傅懋冬所写的《燕

108. 这次修改的是其中最后 1/4,此前的部分吴文藻已经为费孝通修改完成[RJ19781020、2110(RJB21)]。

109. 《吴文藻综合材料》,第74页,中央民族大学藏吴文藻档案。

110. 《吴文藻综合材料》,第74页,中央民族大学藏吴文藻档案。

大社会学系沿革及课程设置》一文并最终促使其发表。可见,与燕京大学有关的自觉意识延续到了社会学重建时期。此种自觉意识和自我认同带来了明确的影响,即对于社会学的理解和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学这门学科,他们有着丰富的历史经验和共同的理解,诸如“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主张和中断了许多年的人际网络在重建时期重新浮现出来,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带来了基本的旨趣、视野和行动策略。

七、社会学重建与燕京学派的承续

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都曾经把燕京学派的建设经验总结为“开风气,育人才”“走出去,引进来”以及“社会学中国化”这几个方面。在社会学重建时期,虽然形式不一样了,但是此种精神是一以贯之的。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依然重视并借鉴西方的理论和学科发展,同时也强调社会学研究要紧跟时代形势,面向中国实际,要“学以致用”,服务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费孝通等人在这一时期还频繁出访,不断邀请海外学者到国内帮助建设社会学。这些重建中的许多努力,都是在这个共同体之中或借此共同体而完成的,因此带有当初建设燕京学派之努力的许多痕迹。

(一) 学术共同体在重建中的努力

首先,在酝酿重建时期,诸多工作都是由该共同体集体完成的。如前所述,在邓小平做出社会学“补课”这一指示之前,社会学群体已经为此酝酿了比较长的时间。这一酝酿过程主要是由该学术共同体实现的,如费孝通在重建过程中的诸多工作和文稿都是在这个共同体里讨论完成的,许多历史的经验是由该共同体成员提供的,许多工作的方针政策也都是共同体在非正式的事先讨论中确定的。

在 1979 年的座谈会上,胡乔木代表中共中央委托费孝通“带头恢复和重建社会学这门学科”(费孝通,2000)。在此之前,两人之间已经有所沟通。1977 年 12 月,费孝通给时任中国社科院院长的胡乔木写了一封信,提出恢复社会学。12 月 27 日,费孝通将信件出示给吴文藻,同其“就内容和递信方式相商”(RJB21)。1978 年 7 月 15 日,费孝通和吴泽霖到吴文藻家里,三人开了一个非正式的小会。费孝通告诉吴文藻,他和邓力群会谈了关于建设社会科学的事宜,主题是如何同在美华人建

立联系,请他们邀请社会科学各专业的专家,就各学科20年以来的发展做出摘要(RJB21)。7月底8月初,费孝通和吴泽霖不时来拜访吴文藻,就此议题讨论。8月初,费孝通主笔写成了《哲社科发展规划》初稿,在8月6日下午送到吴文藻家,与吴文藻讨论并修改。

1979年2月,费孝通撰写了“关于建立社会学的意见”一文,同时计划访问美国。吴文藻阅读了“意见书”,提了参考意见,¹¹¹并和费孝通共同商讨访美的路线与计划,制定了初步方案。¹¹²

可见,在社会学重建时期,由费孝通写作的重要文本和许多重要工作,都是由费孝通和吴文藻等人共同讨论完成和拟定计划的,虽然最终只署了费孝通的名字,但工作确实是由这个共同体完成的。

此外,重建时期许多工作的方针政策,都是该共同体以非正式会议的方式事先讨论,然后再由费孝通等人在正式的场合提出和执行的。除了前述几次讨论,类似的非正式会议还有很多。例如,1979年2月2日,费孝通到吴文藻家里,两人讨论了重建社会学的事宜。2月8日晚饭后,费孝通、吴泽霖、林耀华和陈永龄四人去吴文藻家,五人进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主题是如何举办“社会学座谈会”,座谈“是胡乔木催办的,要为社会学恢复名誉”(RJB21)。五人讨论到晚上十点。翌日,雷洁琼也来访,下午两点半方才离开(RJB21)。类似的小规模非正式讨论后来还发生过很多次。例如,1980年2月20日下午,袁方同罗青一起来访,之后费孝通也来到吴文藻家里,四人一直讨论社会学恢复重建事宜到5点方才散去。

在更为广泛的筹建工作中,吴文藻等人也提供了重要的帮助。1978年10月18日,吴文藻与林耀华、陈永龄等人一起参加了由教育部安排的重建社会学系、民族学系的座谈会。林耀华先谈了当年取消这两个专业的经过以及后来人员的安排。吴文藻在发言中先介绍了国外尤其是美国社会学的情况,说明了设置专业和专系的必要性,然后又谈了中国原有的社会学专业以及后来的分布,最后谈了自己认为全国应该建设几个社会学系等问题(RJB21)。

1978年11月25日,吴文藻接受梁钊韬访谈关于重建社会学、民族

111. “上午看人工智能及控制论两文并将孝通拟写‘关于建立社会学的意见书’过目”[RJ19790217(RJB21)]。

112. “孝通饭后来共商访美路线计划,订出初步方案”[RJ19790216(RJB21)]。

学的设想请求,主要就理论、方法和编写教材的体例等方面提了意见和建议(RJB21)。27日,他认真阅读了由林耀华和金天明合写的“关于当前中国民族学的目的和任务”一文,提出了意见(RJB21)。1980年1月28日,他还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刘凤泰等人讲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社会学系设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尤其院系调整后中国社会学人员的情况(RJB22)。

其次,该学术共同体源于燕京学派,该学派留在海外的学者们在重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从沟通交流社会科学前沿进展到寄送资料,一直到杨庆堃联络的匹兹堡大学访华团和后来举办“讲习班”,这一时期重要的海外交流确实得益于吴文藻当年领导建立的燕京学派及其海外交流所建立的共同体。这一学术共同体超越漫长的岁月和国界,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重要力量。我们甚至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对外交流是吴文藻在当年建设燕京学派时“走出去,请进来”这一策略的新版本。

1979年5月30日,费孝通在访美归国后和吴文藻明确表示:“这次杨庆堃出力很大。许烺光见一面即告辞。Redfield 女儿、Sol Tax 亦多予协助。哥伦比亚 Fried 亦多予支持”(RJB21)。雷德菲尔德的女儿是时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的皮蒂(Lisa Redfield Peattie),而 Sol Tax 即特克斯是芝加哥大学的教授,曾担任过雷德菲尔德的助手。费孝通(2009a)在《赴美访学观感点滴》一文中也明确表示,这次赴美访问有三个重点,即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弗里德(即吴文藻日记中的 Merton H. Fried)以及皮蒂和特克斯。此外,他在文章中还着力强调了杨庆堃以及基希(Kish)和施坚雅等学者,而未提及许烺光。

皮蒂和特克斯的态度与燕京学派有直接的关系。1936年,吴文藻在访美途中经由布朗的介绍而认识雷德菲尔德。由于雷德菲尔德是罗伯特·帕克的女婿,所以在此之前,他们就互相知悉。作为当时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院长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任社会科学方面的顾问,雷德菲尔德在1945年吴文藻访美期间给予过他非常多的帮助。两人也在这段时间里讨论了雷德菲尔德的访华计划和讲学内容。¹¹³费孝通在1933年就听过帕克在燕京大学开设的课程,在1943—1944年访问美国期间也得到了雷德菲尔德一家的大力支持(陈希,2021)。正是由于有这段历

113. “吴文藻综合材料(1969)”第60页。资料来源:中央民族大学校藏档案。

史,雷德菲尔德的助手特克斯和女儿皮蒂自然会对费孝通帮助有加。

这一共同体的关系历久弥新。20世纪70年代末,杨庆堃在得知国内的一些动态后,非常积极地希望参与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工作。1978年底,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访问中国。在出发之前,杨庆堃特别建议其中具有社会学背景的成员访问吴文藻,与其讨论关于中国社会学建设的问题(RJB21)。同一时期,吴文藻还接待了曾在云南大学学习过的美籍华人刘德增,由此了解了美国族群研究(ethnic studies)的状况(RJB21)。

1979年9月,黄迪回国访问并拜访吴文藻,带来了关于美国社会学的许多信息。¹¹⁴黄迪对于社会学重建的事宜也非常热心。林耀华去美国访问时,就曾住在黄迪家中。10月29日,吴文藻与黄迪交流了美国社会学发展现状与黄迪本人的社会学研究计划(RJB21)。1982年1月20日,吴文藻收到了回到美国的黄迪寄来的长信,信中介绍了美国部分学者的工作,并随信寄来“一份有关今日美国社会学的简报”(RJB23)。

1979年9月8日,费孝通告知吴文藻,弗思(Raymond Firth)计划10月上旬来访,将安排民族学和社会学两个主题的座谈会,都邀请吴文藻参加(RJB21)。吴文藻对此非常重视,在9月份重新集中阅读了弗思的作品。10月9日,弗思在民族学院演讲,主题是关于人类学研究在农村研究方面的应用以及英国人类学关于东南亚现代化的研究。午后,吴文藻和冰心、吴泽霖、林耀华以及王康等人前往北京饭店拜访弗思,一直讨论到近6点方才结束(RJB21)。弗思送给吴文藻一份当时社会学和人类学的重要出版物的书单¹¹⁵,在回国后,还专门给吴文藻寄来了自己最新的论文。¹¹⁶

1979年12月4日,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访华团来访民族学院,杨庆堃也随团回京。吴文藻多次和费孝通、杨庆堃等人讨论重建社会学的事宜,并向来访教授索取了关于“现代化”的相关课程大纲。¹¹⁷

114. “午后3:00许黄迪、林惠光来访,带来很多礼物,谈约一个半小时关于美国社会学几个流派,很融洽”[RJ19790923(RJB21)]。9月26日,吴文藻又在民族宫宴请黄迪夫妇,参加者有翁独健和林耀华。

115. RJ19791016、1103(RJB21)。

116. RJ19810529(RJB22)。

117. 吴文藻并未直接记录获得该课程大纲的事宜,但是在RJ19800606中记录了自己向费孝通“讨还匹兹堡大学里两位教授编写的讲学大纲。题为‘社会学为现代化’,共27页”。到了10日,他仍“集中精力阅看”,11日读完。参见RJ19810606、0610、0611(RJB22)。

恢复和重建时期的海外交流当然不止上述这些事件。如前所述,吴文藻在燕京大学时期的地位和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交往以及他在日本工作的经历,使得他在这一时期成为代表中国社会学对外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这些对外交流成为中国社会学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吴文藻在建立燕京学派时期所形成的共同体和所积累的学术关系,不仅为他在这一时期提供了重要的知识储备和学术视野,也为恢复和重建社会学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与人力资源。

(二) 重建中的经验和视野

在“自传”中,吴文藻(1982)把自己在燕京大学时期的工作总结为课程建设,即通过派出去和请进来的方法培养专业人才,引进西方理论和展开对中国社会的社区研究,提倡社会学中国化。费孝通在重建时期提出了著名的建设社会学的“五脏六腑”说。“五脏六腑”的具体内容可能和建设燕京学派的内容有所交错,但其中行动的经验 and 思路是一以贯之的。从吴文藻的日记中可以发现,燕京学派当年所积累的中国社会学的早期经验为重建提供了重要参考,该共同体在六七十年代的阅读也为重建提供了诸多想象力。

首先,将人才培养视为社会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是两个时期的共识。1982年,在《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费孝通(2009b:283)指出,“当前最主要的,我认为是培养新一代”。同年,他再次强调,“我们把培养新一代社会学者作为当前建设这门学科的首要任务”(费孝通,2009c:296)。对于费孝通来说,对于人才的重视是重建社会学时期从燕京学派那里获得的重要经验,正如他在《开风气育人才》一文中说,“我们还得从他所指出过的路子上去解决这个充实和提高社会学内容的问题”(费孝通,1996:19)。不仅费孝通,吴文藻也在重建时期的多个场合不断呼吁过这一点。1980年2月9日,在民族学院的春节茶话会上,吴文藻的发言就主要集中在“培养中青年师资,提高教学质量”等方面。当晚,他在日记里写道,这个发言“引起领导重视”(RJB22)。到了1980年12月20日,吴文藻在学院座谈会上再次提出要在“提高教学质量”的基础上“扩大招生名额”(RJB22)。

“培养新一代”首先与课程建设有关。费孝通所说的“六腑”指六门基础课程。其中,“社会学概论”和“社会调查方法”是带有普遍性色彩的课程,而其余几门课程都可以从吴文藻所主持的燕京学派以及他

们在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中找到历史渊源。“城乡社会学”亦即“社区概论”，明显是在延续社区研究的主张；“社会心理学”则让人联想到吴、费二人在六七十年代对于弗洛姆等学者和社会心理学著作的阅读；¹¹⁸“比较社会学”是吴文藻在“社会学中国化”的计划中所要做的工作，费孝通（2009b：283）说该课程“即过去的社会人类学”，这更强调了这一课程来自于吴文藻的重要创举，即在中国把社会学和人类学结合在一起展开社区研究，并将不同区域的社区研究加以比较的做法；最后，“西方社会学理论”这门课程的设置则毫无疑问来自于吴文藻等人一以贯之地引入理论的努力。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一文中，费孝通（2009c：301）强调，“为了培养下一代我们也必须有这一门介绍西方社会学的课程。比较现实的办法是在西方社会学家中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个一个人地进行研究。先把这些人的著作读通，即使不能全部读过，重要的代表作的原文必须一字一字地读，千万不要依靠二手材料来立论”。这一观点显然和以吴文藻为中心的学术群体在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态度一以贯之。

由此可见，社会学重建时期的基本学术视野都和燕京学派的经验以及这个学术共同体在六七十年代的学术阅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在具体的课程建设方面，当年把“改造课程”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第一步的吴文藻显然富有经验。他在1979年后参加了民族学院和北京大学的多次会议，参与建设了民族学院的“民族学基础”课程和北大的“西方社会学名著选读”等课程，还给自己的研究生开设了研讨课。

根据自己的经验，吴文藻在教学方面给出了详尽的建议。例如，在民族学的学科发展方面，吴文藻认为民族学教学应该分中国民族志和世界民族志两部分，在国内应该重点展开农村研究，同时不应该忽略对于世界民族志的研究，包括实地研究。这很明显是延续了他在燕京时期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边政学发凡》里的号召以及他在六七十年的学术阅读。在理论方面，他强调对于经典的精读，马林诺夫斯基、布朗、利奇和弗思等学者的著作是阅读重点。

118. 即使在重建时期，吴文藻等人对于社会心理学也非常重视。1983年7月9日，北京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成立大会，吴文藻请假没有出席，而是在家里读了汪清写的《苏联社会心理学的发展与现状》一文，并将其与米德的互动论以及库利的镜中自我概念相对比（RJB23）。

这段时间里,吴文藻还借着写作自传的机会,回顾与总结了当年在燕京大学的经验。他认为,相对于社会学教育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大学教育,自己还是更加偏向于通识教育。原因在于,过于专业化的教育“太窄狭,从长远看效果不好”。¹¹⁹这一观点不仅是他自己的,也是早已故去的潘光旦一直秉持的教育观点。吴文藻特地把这一观点写在了自传里,以表示重视。1981年4月13日,他还专门找出民国期间由国联教育考察团撰写、国立编译馆编译的《中国教育之改进》一书,阅读了其对于中国大学教育的建议,认为可供借鉴(RJB22)。

其次,对于中国社会学史和西方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与学习以及将其消化、应用到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中,是重建时期的重要行动逻辑,而这一逻辑与燕京学派的经验以及该学术共同体的视野和眼界都有直接的关系。

在重建中国社会学的过程中,费孝通确实强调学习中国社会学历史上的建设经验。他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一文中强调,“对于西方社会学和旧中国的社会学,我们也要认真地研究,不仅对它积累的大量知识要认真研究,就是对它使用的方法也要认真研究”(费孝通,2009c:294)。在这方面,吴文藻积极地发挥了自已的作用。1980年5月,在第一次社会学讲习班上,他讲述了中国北方的社会学历史,主要以燕大时期的社会学建设经验为主。事后,吴文藻花了很多天,认真修改了自己的讲稿,交给费孝通留存备用。

如前文所述,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对于西方的社会理论和对外交流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这正是燕京学派建设的经验之一。费孝通(2009c:301)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这篇文章最后再度强调,要“继续开展与国外的学术交流”。从《赴美访学观感点滴》等文章可以看出,费孝通赴美访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了解美国新近发展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在这一时期,吴文藻等人一如既往地坚持阅读西方学界的著作,保持着对于世界学术前沿的视野。同之前的阅读类似,这一时期的阅读也可以大致分为如下几个类别。

其一是从中国社会发展角度出发,对于社会学和人类学整体发展的关注和阅读。1979年5月23日,吴文藻从费孝通处取来一些“社

119. RJ19820107(RJB22)。

会学人类学新书”，回家后“随即翻阅。先粗看各书内容、目录并作卡片。后选题摘记。竟日作此工作”（RJB21）。在这些著作中，吴文藻在社会学方面对从帕森斯到默顿的结构功能主义尤为关注，¹²⁰同时也关注社区与社会，即农村与都市社会或者说前工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比较研究，并将其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对比思考。¹²¹到了6月7日，吴文藻“竟日摘抄关于 Tonnies, Durkheim, 工业化三个阶段等有关资料”（RJB21）。总体而言，他越来越关注现代化、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主题以及相关的城市研究、城市规划、犯罪学、自杀和老年学等方面的研究。¹²²他对贝尔的书非常重视，甚至在1980年希望能够翻译他的著作。¹²³在人类学方面，他重新阅读了利奇和弗思等学者的著作，开始阅读 Adam Kupe 的著作 *Anthropology and Anthropologists*，尤其关注其中以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为代表的功能论。¹²⁴

其二，他继续关注知识社会学的领域，并将这一兴趣发展到对于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方面以及科技对于人类社会的影响方面。1978年9月6日，吴文藻开始阅读怀特海的《科学与近代世界》一书（RJB21）。9月12日，吴文藻重读了两篇文章，主题分别与默顿的“知识社会学”和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学”有关（RJB21）。9月16日，吴文藻在日记中记录到：“知识社会学主要涉及 Marx, Scheler, Mannheim 三人的学说”（RJB21）。之后几日，吴文藻又回到了科塞的《社会学思想名家》等著作中关于知识社会学的部分。1979年，他开始尝试翻译曼海姆的部分作品。¹²⁵1981年，霍尔兹纳的《知识社会学》一书刚被翻译出版，吴文藻就对其进行了细致的阅读和摘录。1982年初，吴文藻继续阅读和知识社会学有关的著作，包括科塞主编的默顿的《社会结构的观念》（*The Idea of Social Structure*）一书中关于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的

120. 1979年9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上午回到社会学当前五个主要流派。我特别注意结构—功能论，以 Parsons 和 Merton 为代表。”10日再度说：“专阅有关结构功能主义的材料。Parsons 写的专文值得认真阅看。”（RJB21）

121. RJ19790528（RJB21）。

122. RJ19790608-0616（RJB21）。

123. RJ19800927（RJB22）。

124. RJ19791107-1110、RJ19791214（RJB21）。

125. RJ19790730：“午后换脑筋看 Mannheim 一段文字，试汉译初稿”。RJ19790801：（上午看文献）“看得眼花，转到 Mannheim 那段未译完的话”。（RJB21）

部分。从 1982 年 2 月 3 日开始,吴文藻翻阅了 Ian Robertson 的 *Sociology* 一书,以确定否值得翻译,但是在随后的数日中,他的阅读集中在了其中关于科学社会学的章节以及“都市化与都市生活”的章节。从 1982 年 3 月一直到 8 月,吴文藻都在阅读霍尔茨纳(B.Holzner)的《知识社会学研究》一书,重点关注其中的科技和现代化的主题(RJB23)。

其三,吴文藻还重视社会学的经典理论及其新发展。1981 年,他阅读了涂尔干的《社会学与哲学》一书。从 1982 年到 1983 年,他一直在温习经典学者的工作,还认真阅读从国外寄过来的和国内能找得到的最新期刊和出版物,¹²⁶ 并做摘记、做卡片、写笔记。他的阅读范围从知识社会学和结构主义¹²⁷ 逐渐扩大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的传统(包括现象学人类学和常人方法学)、文化相对论以及现代化等领域。¹²⁸ 1983 年 7 月,第十届世界社会学大会召开,吴文藻尤其关注其中社会学理论和科学社会学的主题。

所有这些阅读,吴文藻都和费孝通保持着随时的互相交流。他们在收到外国社会科学的资料后会在第一时间和对方沟通。有时费孝通忙于公务,吴文藻则会在阅读后做出摘要,以备双方查阅。¹²⁹

在社会学重建时期,这样的视野非常重要。它既为《社会学概论》等教材的编写和校阅工作提供了很大帮助,也成为其他一系列学术建设的可能性之所在。1980 年,吴文藻为商务印书馆提供了一份社会学名著的书单。这一书单偏向于经典部分,即从涂尔干、韦伯和曼海姆等人到帕累托。¹³⁰ 1981 年 4 月 8 日,吴文藻再度向商务印书馆提供了偏向于

126. 除了对于新进化论的主题持续展开研究,1983 年 1 月,吴文藻还阅读了 Joseph B. Aceves 和 H. G. King 合著的 *Cultural Anthropology* (General Learning Press, 1978) 一书。1983 年春节期间,吴文藻阅读了雷蒙·阿隆的《社会学主要思潮》一书。同年年初,吴文藻开始阅读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一书,这本书成为他在 1983 年和 1984 年经常阅读的书籍。

127. 1981 年 12 月 19 日,黄淑聘来请吴文藻为自己写的论文提意见。吴文藻建议她展开关于列维-施特劳斯和摩尔根等的研究。

128. 参见 1982 年 5 月至 6 月日记。1983 年 1 月,吴文藻的阅读记录中已经明确写下了哈贝马斯(Habermas)和舒茨(Schütz)的名字。1983 年 2 月底,吴文藻已经开始阅读弗洛姆和马尔库塞的著作。1983 年 8 月,吴文藻的阅读开始涉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的关系。

129. RJ19790223 (RJB21)。

130. RJ19800826、0827-0905 (RJB22)。

现代部分的汉译世界名著的社会学书单,包括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和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等名著。此外,吴文藻还参加了一系列专业词典的编写工作。他为民族出版社的《英汉、汉英民族学术语》逐条校对中英文的术语翻译,并为其写了序言,此外还参与编写和修订了《社会学名词英汉对照》词典。1981年元月1日,吴文藻还收到了上海社科院的来信,讨论编写《社会学小词典》的事宜。

吴文藻在长期阅读中积累的知识以及他和海外的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了这些词典的编写和修订上。例如,黄迪和吴文藻一直保持着的学术交流对词典编写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982和1983这两年间,吴文藻和黄迪之间的信件多在讨论对概念的翻译与理解问题(RJB23)。其中,1983年4月14日,他接到黄迪长信,“从30多页看起”,次日读完长信后“同意他建议 cross-cultural 改译跨文化、多文化”(RJB23)。

这一学术视野不仅体现在社会科学方面。1981年8月19日,吴文藻的老友张锡彤之子张广达来访。吴文藻得知其将赴国外从事研究,建议他以布克哈特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一书中所使用的方法,“来研究盛唐文明史全貌,采取制度入手法,必有所得”(RJB23)。

对于西方理论,阅读是吴文藻毕生一以贯之的兴趣所在。早在燕京时期,他发表的大量论文就以综述和介绍各种西方社会理论为主。他当时希望通过大量阅读和引入西方理论,找到一种适于中国社会研究的理论,并在实地研究中将其中国化,以作为“社会学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重建时期的学术阅读显然延续了此种社会学中国化的旨趣。

(三)重建社会学的学术旨趣

首先,正如许多学者发现的,重建时期存在着某种明确的学术旨趣(阎鹏,1990;胡洁,周晓虹,2023),即社会学重建要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此种学术旨趣实际上是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的高度共识。

在《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一文中,费孝通(2009c:295)提出,中国社会学的重建要“以结合中国社会实际,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为其目标”。在《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经过的回顾和体会》中,他再度明确了这一重建方针(费孝通,2002:340)。

1979年3月16日,在“社会学座谈会”上,继胡乔木和费孝通发言之后,吴文藻做了题为“社会学与现代化”的长篇发言。¹¹发言内容主要

131. 由于身体不适,这一发言是请王晓义代为朗读的。

集中在对于国外社会学动态的认识和介绍上,除了关于现代化、后工业社会、未来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内容,他还关注到了人类生态学以及城市规划这样的前沿领域。吴文藻尤其强调,中国社会学在重建以后要既能够关注中国现代化,敏锐把握时代脉搏,服务中国社会的发展,又能够了解世界社会学的前沿理论,借鉴经验,对于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有所预判和准备。

这一发言内容和费孝通所提出的社会学要“服务中国现代化”的主旨高度吻合。这一吻合既是两位学者在长期的共同阅读和讨论中得出的基本共识,也应该与他们在准备这一座谈会和重建时的多次讨论有关系。

和这一面向中国现代化的旨趣相呼应,在重建时期,吴文藻不只关注国外社会学发展的动态,对于国内社会学重建中的研究成果也一直非常关心。除了定期阅读社会学杂志如《社会学通讯》《人类学通讯》和《社会学》等期刊外,他还一直在密切关心和跟踪瞿同祖、费孝通、林耀华以及陈永龄等人的工作。如在重建初期的情况一样,许多工作实际上是这个共同体集体完成的。

1979 年 9 月 2 日,费孝通给吴文藻送来自己写的《中国的现代化与少数民族的发展》一文,请吴文藻提意见。吴文藻“随即把大参考放下,看他的论文,一口气看完”,在第二天做摘记,提出修改意见,在 5 日将两点意见交给了费孝通(RJB21)。1980 年 1 月 24 日,吴文藻阅读了费孝通的《迈向人民的人类学》一文,在日记里写道:“我看了很兴奋,他能融会贯通,以通俗语言表达学术上的见解,这是一大优点,值得我效法的”(RJB22)。

1980 年 10 月 10 日,吴文藻开始读费孝通赴香港中文大学演讲的稿件“中国的现代化与社会问题研究”,25 日方才读完。1983 年 11 月 9 日,吴文藻读了费孝通的《小城镇、大问题》,认为“思想、方法均有特色”(RJB23)。1985 年 4 月,吴文藻阅读了费孝通写的《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一文,认为文章写得极好,可以和钱伟长的文章对照阅读。他骄傲地写道:“旧清华出了一批人才”。¹³²

其次,这一旨趣要求中国社会学对于理论和方法的阅读与借鉴要

132. 1984 年到 1985 年间,吴文藻对于国内学者的阅读,集中在丁学良、钱伟长和费孝通等人的工作之上[RJ19850411(RJB23)]。

落实在对于中国社会的 research 上。在这方面,中国社会学研究人员需要有“自觉”意识,也就是社会科学的中国化问题。

1981年2月16日,晏升东邀请吴文藻在5月份前往南开大学为社会学专业班授课(RJB22)。吴文藻接受了邀请,计划讲授功能派人类学的理论。他为此重读了费孝通的博士论文,将其作为把功能论应用到中国农村社会实地调查的案例。他还专门查阅了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课程目录与教授名单,以作为中国重建社会学的参考,又重新阅读了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的著作。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他认真撰写了赴南开讲课的讲稿大纲。¹³³

1981年12月23日,吴文藻在参加社会学会理事会的分组讨论会时提出,在中国社会学的建设过程中,要加强对于“知识社会学”和“认识人类学”等方面内容的介绍,建议“在社会学概论中是否考虑添一章,以便发扬调查人员的自觉能动性”(RJB23)。这里的“添一章”指的是增加“知识社会学”和“认识人类学”的内容,但目的却是“发扬调查人员的自觉能动性”。这意味着,引入知识社会学的目的在于,对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有反思性的认识,以提高在实地调查过程中的知识方面的学科自觉性。此种对于学科自觉的强调虽然不能与后来费孝通所提出的“文化自觉说”直接联系起来,但的确可以说是当年“社会学中国化”的发展,同时也是“文化自觉说”的先声。吴文藻在此提出的“自觉”,很明显是通过知识社会学的训练,帮助实地研究者反思和认识自己所使用的方法和所做的田野研究,并由此反思这一学科及其所生产的知识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这与费孝通(2002:360)后来所说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在思考结构上有着类似之处。

1984年年初,吴文藻应人类学会的要求,计划写作一篇主题为“什么是中国式人类学”的文章。吴文藻在初稿中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后来又对“中国式”有了进一步的思考,认为这篇文章应该集中在“中国特色”方面,遂准备通篇修改。¹³⁴这一文章的写作有着更为长远的

133. 不过,后来由于身体原因,在潘乃谷的反复劝说下,吴文藻取消了南开的行程[RJ19810406、0408(RJB22)]。

134. 不过,由于健康原因,本文并未完成。

铺垫。除了“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背景,在重建时期,吴文藻一直在思考社会学研究中国本土文化的问题。1978 年郭沫若去世后,吴文藻感叹自己读过的郭沫若的文章太少了,他认为,要想真正懂得中国社会与文化,鲁迅和郭沫若的文章是必须读的(RJB21)。

1982 年 6 月,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部邀请吴文藻和费孝通在次年春天赴港参加学术会议。吴文藻欣然同意,决定“题目拟选《社会科学中国化》”,¹³⁵并为此做了充分准备。¹³⁶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吴文藻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有二:其一,1979 年的“社会学与现代化”的发言中所提出的中国现代化问题,其二,“中国式人类学”的问题。和这一自觉意识相关的,是他对于中国社会学研究的实地研究取向的强调。这当然是燕京学派最重要的方法论要求。吴文藻渴望展开研究工作。这段时间里,他阅读了许多关于实地研究的资料。1980 年 1 月,他一直在阅读弗思关于实地研究的方法论学说。1980 年 2 月 2 日,他写道:“对民族志实地调查方法的理解逐步深化”(RJB23)。1980 年 12 月 5 日,他接待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孔迈隆(Myron L. Cohen)时,还与其讨论了中国的人口控制问题和现代化问题以及后者在中国展开实地调研的计划。1982 年 1 月 19 日,吴文藻拿到了费孝通《民族社会学调查的尝试》一文的油印本,非常激动,“一口气看完,讲得有力。对中青年干实地调查,作微型研究,有鼓舞作用”(RJB23)。

第三,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的理解,尤其是科技发展对于现代社会和社会学研究的影响问题。吴文藻在六七十年代对于知识社会学的兴趣,除了走向对于中国社会学自觉意识的思考之外,还走向了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面。1978 年 8 月 25 日,吴文藻在日记中写道:

我看环境保护、未来学研究等材料,未来研究(到 2000 年)与超工业时代有关。不过未来学那篇文章未明言及之而已。美苏社会学界都对此主题进行研究。我国看来是由哲学来进行研究。惟我认为应建立社会学机构来担任研究。首先密切关注今后十五、二十年内科技的发展趋势,其次探讨科技迅速发展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结果。(RJB21)

135. RJ19820608(RJB23)。

136. 冰心在 1982 年 11 月 17 日摔倒住院,吴文藻随即取消了赴港事宜。

由此可见,他虽然关注西方的理论,但是落脚点还是在中国社会的发展之上,尤其关注科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所带来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议题。

1984年5月,吴文藻读了约翰·奈斯比特的未来学著作《大趋势》一书,并做了摘记。1984年12月4日,他在此前阅读的基础上认为,“由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这是未来大势所趋”(RJB23)。1985年6月6日,吴文藻阅读了《光明日报》的几篇关于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的文章,尤为注意其中所表述的科技发展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当天,他在日记中写下:“电脑教育、半导体新技术的重要性”(RJB23)。

中国社会学重建40年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发现,吴文藻的这些兴趣、阅读以及他对于中国社会与社会学发展的判断显然是极具超前性的。他当年在燕京大学所提倡的“社会学中国化”以及为了研究中国社会而提倡的社区研究,乃是基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伴随着时代、科技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化,“社会学中国化”以及对于中国社会展开研究的议题、内容与方法当然也需要新的“从实求知”。

八、总结与讨论:一种知识考古学场域的意义

在关于知识考古学的论述中,福柯(2016:45-46)对于何谓“作品”提出了疑问:一个人的作品,是否仅指他发表出来的、可以汇总为其“作品全集”的那些篇章?显然,一位学者的书信、笔记、对话乃至日记等,共同构成了以其为中心的无限多的交叉点,而所有这些都构成其作品。

进而,福柯希望能够找出通常被视为“作品”之前提的那些尚未被说出的东西。他认为,“话语中恰好变成词语的所有言说总被发现是在先行于话语的、固执地在话语之下运行着但又由话语揭示并渲染其静默的那种半沉默之中被联结着的”(福柯,2016b:48)。从此种知识考古学的理论出发,我们发现,在社会学重建时期的知识生产呈现出一种颇能提供社会学想象力的知识考古学场域。

首先,学者们对于重建的思考和行动是本文加以考察的落脚点。我们发现,这一重建并非在一片空白之上展开的,而自有其历史的根基,

这一历史根基也有其进一步的历史脉络。我们看到,吴文藻在六七十年代的阅读和研究兴趣,如他在 60 年代对于印度和中国西藏地区的研究与阅读,与他的生命史和研究谱系高度相关,所遵循的路径也与他早年的《边政学发凡》颇为一致。他在 60 年代所做的社会学、人类学与民族学各个学派的梳理工作,也与他在 30 年代的一系列引介西方社会理论的文章有着明显的承续之意。

其次,与福柯所研究的两种知识并不相同,吴文藻先生的学术阅读就其本身而言并非福柯所说的那种作为实在的科学系统之可能性的知识,而更像是科学的知识系统本身。然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此种知识本身是被禁止的,只能作为“外来知识”的形态而存在,与其相关的日记写作也因此成为一种“喃喃自语”,成为这一时期显性知识系统之外的知识——这与吴文藻先生及其学术共同体的自我塑造也息息相关。

社会学重建的标准叙事起点也由此更像是一种知识与权力的“转折点”:在重建起点之后,此前静默的知识开始从历史中浮现,重新获得空间和权力。由此,吴文藻先生的阅读才成为一种奇异的“史前史”,即带有高度的预见性和准备性,为费孝通所主导的社会学重建和新的社会科学知识的构建提供了条件、视野、历史经验以及诸多可能性。

使得这一史前史得以可能的是一种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学术共同体。作为一种共同体行为,六七十年代吴文藻先生的此种阅读,在三个方面成为社会学重建的根基:首先是保证了在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等方面的学术性基础知识、视野和前沿性;其次,在这群学者所形成的共同体中,从生活到学术,他们互相之间紧密联系,延续和发展了当年在燕京学派时期所形成的共同体,为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提供了基本的保障和经验;最后,在重建过程中,当时当地的政治、社会的条件与结构以及外来的知识和此前长期的自我塑造与燕京学派的历史,所有这些因素紧密结合在一起,使得该共同体发展出了社会学在重建后服务中国现代化的学科旨趣,也接续了当年“社会学中国化”的学术自觉意识。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的重建起点也是再一次的“社会学中国化”的起点。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陈希.2021.“最后离开的第一批”:福布莱特学者雷德菲尔德的中国之旅[J].世界历史评

论(2):163-181.

- 邓小平.1993.坚持四项基本原则[G]//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费孝通.1996.开风气育人才[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4-19.
- 费孝通.2000.重建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回顾和体会[J].中国社会科学(1):37-51.
- 费孝通.2002.师承·补课·治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费孝通.2009a.赴美访学观感点滴[G]//费孝通全集(第八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费孝通.2009b.关于社会学的几个问题[G]//费孝通全集(第九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费孝通.2009c.建立我国社会学的一些意见[G]//费孝通全集(第九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福柯,米歇尔.2016a.福柯文选 III:自我技术[M].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 福柯,米歇尔.2016b.福柯文选 II:什么是批判[M].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 胡洁、周晓虹.2023.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社会学学科建设40年[J].社会学研究(2):1-25.
- 潘光旦.2000.潘光旦文集(第11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
- 孙飞宇.2025.吴文藻传:从社会学中国化到重建中国社会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 阎鹏.1990.社会学在中国——过去、现在和未来[J].社会学研究(6):12-22.
- 杨善华.2019.社会学的恢复和重建[G]//中国社会学四十年.张静,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 王炳根.2014.吴文藻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J].读书(10):117-123.
- 王育民.1989.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大事记(1979—1989)(一)[J].社会学研究(2):124-126.
- 吴文藻.1982.吴文藻自传[J].晋阳学刊(6):44-52.
- 吴文藻.1986.中译本序言[G]//列维·施特劳斯.埃德蒙·利,著.王庆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吴文藻.2010a.德国的系统社会学派[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吴文藻.2010b.中国社区研究计划的商榷[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 吴文藻.2010c.《社会学丛刊》总序[G]//论社会学中国化.陈恕、王庆仁,编.北京:商务印书馆.
- 杨心恒.2015.说说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J].炎黄春秋(1):32-37.
- 张龙.2021.中国社会学重建的知识社会学考察——以1981年“南开班”为例[J].中国研究(27):227-303.
- 周晓虹.2023.中国社会学的重建:现代化与转型叙事——辅以40位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为线索[J].社会学评论(4):5-27.

责任编辑:田青
实习编辑:郭琦